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1月31日第1期

### 本期目录

#### 发刊词

【文革日记专辑】

本刊特稿

[范世涛 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昨日心迹

[王 林 日记中的大字报信息与马路新闻](#)

[郑楚鸿 大串联中了解到的大饥荒](#)

[任冬林整理 湖南一中专学校学生日记摘选](#)

[陈仁德 滚一身泥巴的日子——插队知青日记选](#)

[孙丹年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

文摘

[吴 宓 遭受大会批斗实录](#)

[叶浅予 改造日记（节选）](#)

简讯

[边 犊 2011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 发刊词

“昨天”，曾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今天”；

“今天”、“明天”，很快都会成为“昨天”。

“昨天”就是历史。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此可见，“昨天”与“今天”密不可分。回顾昨天，研究昨天，正是为了今天能活得更好，活得更明白，更充实，更愉快。

本刊以“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宗旨。

在一些文革亲历者纷纷如秋叶般凋谢，而有关档案又迟迟不能开放的现实情

况下，抢救回忆和积累资料成为文革研究者亟需抓紧的前期工作、基础工作。傅斯年有言：“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在文革历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抢救、搜集、整理与积累，应该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应该有更多的有志者来参与。

本刊愿为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交流园地。

本刊暂不定期，也不定篇幅（刊期与篇幅均视稿件的多少而灵活决定）。义务编辑，友情交流。欢迎朋友们不吝赐稿并多多指正！

---

## 【文革日记专辑】

说明：日记，是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记录。写日记，本应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明习惯。然而在“党文化”的宣传教育及一次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日记却不断被规范，被改造，甚至成了被用来罗织罪名的把柄，“思想犯”、“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物证（遇罗克就是因为托妹妹帮忙隐藏的日记被意外搜缴而灾难临头的），因此许多人在文革中被迫烧毁了自己多年的日记而且从此不敢再写日记。但是，人，总是要说话、要表达、要倾诉的，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感想。因此不管怎样严酷的环境，总还是有人写日记并保存下来。这些写于文革时期的日记，是研究那一时代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民俗史、经济史（比如工资收入、工分值、物价、票证等）的极好材料。本刊选编这一专辑，期望能引起更多人对抢救和研究文革日记的重视。

---

### 【本刊特稿】

## 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范世涛

2010年5月，我读到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一书，注意到作者援引了几种红卫兵日记手稿，从此开始关注和收集文革日记。本文以个人的收集和阅读经验为基础，对文革日记承担的功能、存世情况及其史料价值尝试加以考察。

### 一、作为规训的模范日记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定义，规训指的是“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社会通过多种制度（如学校、家庭或文化的力量等）用权力对人的行为、思想进行规训。这种规训不是压制，而是自我管制和参与的过程，结果造就“顺从的身体”和适合主流社会的思想。

日记本来是一种常用的个人应用文体，作者可以以日为单元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感。但在六十年代，这一文体被政教机关广泛发掘利用，开始承担起了政教规训的功能，目的是将那些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塑造为宣教者期望的“革命青年”。《雷锋日记》的流行可以看作这种规训的典范。

雷锋（1940-1962）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是当时的一位先进模范典型。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编者按。雷锋去世后，《前进报》又于1963年1月20日补充17篇，合计摘录发表32篇雷锋日记。（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不久，《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通过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荐这个典型，很快掀起了全国学雷锋的热潮。同年，121篇雷锋日记被选辑出来集成书公开出版，书前冠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究竟《雷锋日记》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多的领导人关注呢？已公开的《雷锋日记》起止时间大体是从大跃进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但摘发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实际生活困难的记录，相反我们读到大量表忠心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种不考虑正确与否、但自觉“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的形象正是政教部门所需要的：

（1960年2月×日）“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1961年1月21日）“今天我在《辽宁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越看越高兴，反复的看了三遍。……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及时给我们指出方向，给我们增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信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啊！我坚决永远跟党走，积极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段话是这样的：

（1960年12月×日）“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为《雷锋日记》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从这则日记中摘引出来的。这几句话因此风靡全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1960年10月21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段话并非雷锋日记的内容，但编者感到“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将其纳入日记正文。（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宣传效果果然“很好”，“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为文革期间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对待其心目中的“阶级敌人”的普遍做法。

《雷锋日记》展现的形象在学校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收集的1965年或1966年上半年间的中学生日记中，大部分都有读《雷锋日记》的记载，内容与王杰在1963年3月29日写的大同小异：“雷锋的日记我不止看了一遍，已看了数遍啦！前天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读了两遍，学习了雷锋我又对照了自己。”这类记载一般包括读过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不足，感到惭愧后表决心内容。在个人日记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类似的记录，表明大批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主动地自觉参与了规训过程。

在《雷锋日记》的热心读者中，最初也包括雷锋本人。被树立为模范人物并摘发 17 则日记之后，雷锋开始在日记中注意写下自己做的好人好事，甚至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升华”。比如：

（1961 年 2 月 2 日）“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作报告，下车时，大北风刺骨的刮，地上盖着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口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将手套借或送给老太太，普通人未必会当作值得记录的事情写入日记；而老太太得到手套后，“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无论如何不近情理。这类记载表明，雷锋本人其实也是《前进报》上那篇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听党的话”主题在 1960 年后的日记连篇累牍出现，恐怕也和《前进报》摘发雷锋日记时的标题有关）为名的雷锋日记的忠实读者，而且像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按照自己对媒体制作出来的偶像的理解主动规范自己的日记行为。我们甚至猜测，他自己或许正是最先认真学习“雷锋日记”、并决心像摘发的“雷锋日记”那样行动的第一位读者。

在《雷锋日记》之后的十多年，凡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往往都会摘引其若干则日记发表，王杰日记、金训华日记、谈建华日记、刘朝生日记、蔡永祥日记、32111 钻井队日记……都是这种情况。这类模范日记的宗旨不在于呈现日记作者真实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而是树立符合政治形势需要的宣教形象。也因为这样，发表这类日记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包括编者精心筛选、认真修改拔高、层层把关润色等环节。经过复杂的发表过程，这些日记往往已经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

我们可以举王杰日记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王杰是一位进行爆破训练时因不慎使炸药爆炸而牺牲的普通战士。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但如果照“事故死亡”处理，所在单位的“四好”就没了，有关领导的责任也要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经军报“笔杆子”加工创造后，王杰成为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相关宣传按照林彪 1965 年 11 月 5 日的指示进行：“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卢弘《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123—124 页）于是，我们在 4 天后的《解放军报》上就读到了以“一心为革命”为题的王杰日记摘抄，里面的格言警句（“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广为流传，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一次是 1969 年 4 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另一次是 1971 年 3 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起草的一份关于中国乒乓球队是否赴日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钱江《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东方出版社，1997 年，第 140 页）

## 二、作为惩罚根据和手段的日记

规训主要通过典范的树立和自我的主动参与来实现，它的另一面则是对远离典范言行的严厉惩罚。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能顺利共同完成“规范人的多样化”任务。

在文革发动时期，以《雷锋日记》为代表的模范日记作为规训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个人日记成为惩罚工具的特点就格外突出出来了。根据在惩罚过程中个人日记发挥作用的差异，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广泛流行的模式：

### （一）作为直接的惩罚根据

我们可以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例子。早在1966年6月10日，学部召开党员大会收缴了旧学部党委记录本和一批个人日记本，由政治部人员保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吴传启对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的秘书周云之说：“党委记录和这批笔记本决不能落在别人手中，党委记录中还有潘的材料，给他们搞去不好，你立即把这批东西放在潘家中。”工作组进入学部后，吴又告诉周云之：“我已同关锋联系过，就说中央文革要用这批材料，谁也不能动。”周云之将钥匙送到中宣部交给关锋，由关锋妻子周英收下。7月21日，陶铸、关锋来学部时，关锋将钥匙交给陶铸，陶铸又给了工作组组长张际春，张际春又给了潘梓年，潘梓年又交给了工作组。（本报编辑部《陶铸王关戚破坏学部文化大革命罪行录》，载《长城》1968年10月30日第5版）

在这个历时十多天的“钥匙旅行”过程中，居然牵涉了新任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学部文革工作组组长、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他的妻子周英、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吴传启。钥匙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郑重，是因为群众如果使用个人笔记公开一些会议的决策细节，学部党委的每一位委员都可能被揪出来，成为上纲上线的批斗对象。所以，这个钥匙旅行其实代表了工作组进驻前后试图控制运动进程的努力。

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对个人日记的约束被打破了。当红卫兵、专政机关或革命群众怀疑某人是“牛鬼蛇神”、“三反分子”、“走资派”、“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科目的阶级敌人时，他们往往直接采取抄家行动，“反革命日记”成为查抄重点。比如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首都红卫兵的“战果”中，包括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油印件）。

这种运动模式也在晚些时候被引进学部。如1966年12月25日，在学部红卫兵联队组织的一次行动中，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分队成员陈全荣和张大明的日记被缴获，而他们的日记中分别记有对关锋和林杰不满的话，陈全荣在日记中更写有“关锋有野心，他要搞陶铸”等内容。于是，广播站不断广播，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陈全荣被“狠狠地打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随后还被扔在六号楼楼梯口的垃圾箱里关了一夜。”（许志英《究竟怎么回事》，载《钟山》2007年第1期）文学所红卫兵分队也从此垮台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案例是哲学所实习研究员朱西昆的遭遇。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导师于光远和龚育之），因父亲是“右派”，在文革中表现并不活跃。但是，1968年初有人拿走他的日记后，发现大量非正统的思想。于是，这些内容很快被摘录出来，群众组织随后发起了第一次对朱西昆的批判会。朱事先一无所知，直到进入会场，才知道会议主题就是对他的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之后，朱给女友寄过两张白纸，还徒步到过通县（他参加“四清”的地方）。大约一周之后的早晨，他身穿“四清”时发的军服去跑步，但再没有回来参加对他的

第二次批判会。当天下午，派出所人员来到学部，大家才知道朱迎着开来的火车自杀了。

类似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日记何罪”的两篇杂文（乐秀良《日记何罪》，载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再谈日记何罪》，载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作者指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他的文章发表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收到上千封来信，很多信件讲述了自己因日记而被批斗、处分甚至判刑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因日记遭祸的情况非常普遍。

### （二）作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虽然日记中的非正统内容可能直接导致灾难，文革期间更常见的情况是先定性、再寻找材料加以论证，日记也成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我手边有两册油印小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日记摘录》（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直属战斗队，1967年3月）、《三反分子大叛徒薄一波的臭婆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明的忠实干将蔡濂的黑日记》（第二轻工业部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1967年11月），它们显然是在原作者被“打倒”之后，再摘引其日记服务于“批倒批臭”的目的。

这种情况并非群众组织所独有，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各种运动的正式定案材料中也经常见到。比如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编印的《关于王锡鹏“五·一六”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1973年12月，铅印本）影印了邱海平日记、张本日记、陈××日记、梁××日记、王××日记、齐××日记、钟世航日记、冯××日记等8种日记的条文。如果认真研究这8种日记，专案组不难查明王锡鹏谈不上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但他们显然无意这样做，8种日记居然成为王的罪行根据。还比如，1977年北京市委印发《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附上了多份日记照片，但1980年李冬民的案子却彻底平反了。另外，张春桥的两则日记曾被摘引出来成为揭批“四人帮”时的参考材料，两案审理时蒯大富的日记也被摘引用作审判证据。

### （三）作为思想改造的方法

除此之外，文革期间日记还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改造方法。管制者常常要求专政对象每天写思想日记（有时称为“认罪日记”、“改造日记”）上缴，这样就可以及时掌握管制对象的“活思想”。《顾准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曾经扼要记下自己写认罪日记的经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张姓红卫兵“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不过，这类日记很少达到目的。因为专政对象明白危险所在，会小心翼翼地应对，不大可能因此被抓住把柄；管制者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往往读得并不认真。所以，双方对这类日记其实都并不真正重视。

## 三、日常记录并未消失，文革没有摧毁日记

在惩罚的威胁下，一些人担心飞来横祸，在文革初期毁掉了自己的日记，并且不再记日记。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习惯开会时带上一个本子，时不时记一记；下班后或运动之余，也常常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惩罚的严重威胁与日常记录依然流行同时并存，这种情况似乎有些矛盾，但也不难理解：感到安全的人们（如张春桥、蒯大富）不会担心日记被查抄，也就不会担心写日记会有危险。即使注意到日记可能带来麻烦，人们也会努力找出应对办法，比如将写成的日记藏到安全的地方（如可靠的亲人家里，或者机关的保密柜中）；对违碍字句加以涂改或撕掉；写日记时不加评论，不写“活思想”，只记事实或别人的发言；在日记中点缀一些政治正确的词句，如此等等。这些因素使个人日常记录仍然能够大量形成。

所以，当我读到王友琴一篇标题为“摧毁日记的革命”的文章时，感到有些惊讶（<http://spaceking.blog.edu.cn/2006/192924.html>）。她在文章中例举了不少因担心作为“材料”使用而停止记日记的生动案例，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她认为“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我不这样看。学部是文革中受损极为严重的单位。在文革爆发时，这个单位大约有 2000 多人。我只访问过其中的 20 多位，但发现就有 3 位受访者留下了文革时期不完整的个人日记。另外，目前已经有四部包括文革经历内容的学部研究人员日记公开出版（《俞平伯日记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年；《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 年），我自己还买到了一部学部文学研究所某战斗队核心人物 1966 年的日记，一位民族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日记则被别人买走了……这与访问上千人却“几乎没有人写日记”的结果距离甚远。

不仅这样，自 2010 年 5 月以来，我陆续在旧书市场上购得上千万字文革期间日记原件。作者单位包括地质部、交通部、二轻部、国家体委、华北局计委、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朝阳区财政局、朝阳区查抄办、海淀区农林局、颐和园管理处、新华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景山学校、河北北京中学、第二十五中学、草桥小学、北京军区大院管理局、市百货公司、北京某机械厂、北京某国营农场等；作者的身份也形形色色，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研究人员、编辑、售货员、农场职工、解放军战士、工作组成员、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军宣队员、工厂军代表等等。考虑到文革结束以来，大量重要的日记已经散佚（如彭小蒙日记、周景芳部分日记都被家人处理），我的收集经验或许可以说明，文革时期写日记仍是相当普遍的行为，并且直到现在仍有数量可观的日记留存下来。

其实，近些年来文革日记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以我有限的了解，除了上面提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已经整理（有的在整理时进行了大幅修改，如杨沫日记）出版：

梁漱溟《日记》，载《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  
杨沫《自白——我的日记》，载《杨沫文集》第六、七卷，花城出版社，1995 年；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谭其骧《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 年；

杨国宇《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自印本，2001年；  
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刘雪峰《尘封的记忆——一个造反派的文革日记》（上下），华夏出版社，2008年；  
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张新蚕《家国十年》，作家出版社，2010年；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载《竺可桢全集》第18卷、第1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  
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自印本，2010年。  
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是并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惩罚的威胁，很多人确实销毁了日记或不再写日记，但各个阶层写日记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而且留存下来的数量极为庞大，这为发掘和利用日记史料提供了客观基础。

#### 四、文革日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规训与惩罚工具的日记，通常经过了精心摘录甚至修改的过程。所以，当作严格的史料使用需要小心。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整体来说，日记的可靠程度远远高于大字报和揭发交代材料，我们之所以在定罪文件中经常读到摘引的日记条文，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记的可靠性更高（特别是附录原件照片的情况和直接引语部分），引用日记会使定案显得更为严谨。

现在，发掘和利用文革日记已不必服务于给定的宣教或惩罚目的，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方面。作为文革史料，日记能够从多方面补充或订正文革小报、正史、回忆录或口述历史等文献的不足。

##### （一）准确的时间框架

回忆录或口述史经常时间模糊、甚至颠倒错乱，而日记记录的时间一般来说是准确可靠的。

有一次，一位老师说到工作组时期为了压下各个中学反工作组的势头采取了军训的办法，并提及清华大学附中在文革初期去军训的时间为1966年7月19日或21日；但也有文章说，派到清华附中共工作组“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及《记忆》第10期）。清华附中学生到底是哪一天去沙城军训的？

我翻读了一册名叫“刘运通”的清华附中同学的日记，在1966年7月21日（星期四）条下发现如下内容：“一点半从家返校，两点多一点到校，后睡觉。6点一刻起床，打行李，吃早饭，集合。八点多从校出发，八点二十到南门，十一点到电力学校；十一点半到西直门车站，12点半上车，一点吃东西，将近五点到沙城下车；后打开行李，铺床，六点吃饭；饭后看电影，正片《南征北战》，



加片《雪原民兵》（正片时我睡觉）。”这就可以确定，清华附中去军训的准确时间是7月21日。

## （二）关键事实的澄清

随着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关于文革基本事实的描述被不断修改，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存在大量矛盾，但这些叙述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日记作为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形式，可以为筛选、整理和重新组织不同时间的描述提供关键性帮助，从而使事件的基本面貌和相关描述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来。

我曾经以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师的日记为基础，考订和组织不同时期对红卫兵抓走彭真这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范世涛《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载《记忆》第61期，2010年）。其实，此类研究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 （三）领导指示基本内容的记录

文革前期大量领导讲话被传单和小报公开，但文革中后期的舆论环境发生变化，领导的意见不再公开透明了。而文革日记中则保留了不少领导指示的传达记录。

以下内容来自笔者收集的一位国家体委军管会人员日记。

1970年6月4日晚10点至6月5日凌晨零点50分左右，周恩来、董必武、江青、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乒乓球、体操、女篮和男排的汇报演出。表演结束后，江青离去，周恩来留下来接见中国乒乓球队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并与体委军管会领导谈话，其中谈到体育系统怎样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你们内部主要是体院刘长信，表面上反贺龙，实际上捣乱。”“这恐怕是‘5.16’分子。”“国家队年轻人不懂，可以原谅，刘长信是一小撮。”

1970年6月22-23日体委军粮城干校用两天时间传达和学习了周恩来的这三句指示，还有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的指示：“总理讲到刘长信，体院传达时，要好好借这个东风。刘长信在贺龙问题上捣乱，捣谁的乱？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乱，捣毛主席的乱。你10点声明，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引者注：此处原文空格，可能指‘中央首长’）说：坏到极点了。刘长信不是好人，是反革命。刘长信到农场里还给体委的人写信；刘长信实际上是支持刘少奇，为贺龙翻案的。他支持刘少奇，实际上是保贺龙、荣高棠的，把体委搞得很乱。”负责传达指示的魏新民说，“点刘长信的名，总理从去年到今年，已经是三次了。这是不能怀疑的。这个首先是支部、党员要树立信心，然后带领群众坚定起来。”除了传达总理指示，这次大会还强调是“一个向阶级敌人进攻的动员大会”，并结合学习对专案工作进行了整顿。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专案组支委会很快决定，“在学习班100天之内扫清刘长信组织的外围，并做好对刘长信关于组织问题的总攻准备工作。”7月7日下午三点半，总攻开始。

这些内容对于了解体育系统的运动和刘长信的命运显然非常关键。

## （四）民间生活的生动记录

文革时期的经济生活资料非常零散，这为不可靠的说法流传提供了条件。比如，有一种流行说法称文革时期社会风气良好，“路不拾遗”。但在日记中我们却经常看到相反的记载：

史洛明在1970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地方（引者注：指青海省西宁市）的人，很蛮横，到处可以看到吵架的，售货员同售货员吵，售货员同顾客

吵，顾客同顾客吵……只要是买东西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天天处处都可以碰到吵架的。……今天在黄廊街排队买洋芋的人群中，也吵架打架，把一个小孩子打昏了过去，生死不明；另外在排队买鸭蛋时，人群也是吵架，一个男同志把一个带小孩子要求买两份鸭蛋的女同志，从排队中拖出来了，吵了足足有半小时（每人排队应买鸭蛋三元），看来，这里人们天天在学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唉！这些都停留在口头上的，到涉及一点个人利益时，大家还只想到自己。”（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2010年，自印本，第354页）

统战部沙洋干校一位“五七战士”在1972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位赵姓军代表在干校支部书记会议上传达的11月6日国务院会议精神，称“北京市出现两个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一件，是在天安门烈士碑前面，早饭后突然有1000多人一个多小时把南边18个池子的2万多株花都挖了。警卫人员没理，就把花都挖走了。事后，北京市给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批示：此事出在天安门、正阳门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把2万多株挖走了，民警束手无策，未阻止，也未报告、迅速采取措施。只调查、不采取措施，不像专政机器。要小心两千株樱花树苗也有可能被挖走！第二个事件，抢购粮食。10月30日-11月2日北京市发生抢购面粉事件。从七机部粮店开始的，抢了以后又出现谣言，不是没有白面，而是有黑面，有的人家抢购600多斤。”（统战部某职员日记，本文作者收集）两件事虽然作为“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传达，但日后公开的文献表明，这两件事都是真的（穆玉敏《哄抢天安门广场花坛的背后》，载《人民公安》2011年第14期）。

这类记载表明，虽然文革将“破私立公”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但社会风尚根本谈不上什么“路不拾遗”。

当然，可靠的历史需要多方面的文献相互印证才能确立，而日记也只是一种史料类型。由于每一本日记都隐含了大量关于某地区、单位和某些人物的背景知识，虽然作者熟悉这些知识，普通读者却很难了解。所以，文革史料在各种史料中属于利用难度相对比较大的类型。在阅读各式各样的文革日记时，我就经常遗憾对作者的所在单位、所参加的组织所知甚少，而现有的文革研究文献绝大部分是个人视角的，系统反映一个单位、一个群众组织、一个地区运动变化过程的文献少之又少。这既折射出文革史研究的不足，也影响了文革日记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利用。

## 五、采集文革日记的经验

虽然文革日记的生产数量极为可观，但由于老辈人的故世、搬家等原因，这类作品正在迅速流失。发掘和抢救这类文献的意义，或许可以和发掘口述史料相提并论。

我收存的文革日记主要来自孔夫子旧书网（<http://www.kongfz.com/>）和北京的旧书市场。孔夫子旧书网是国内最大的旧书网，网上经常可以见到文革日记出售。各大城市也大都开辟了专卖旧书的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周六、周日开放，一般周六早晨和上午为佳）、报国寺旧货市场（周四上午最热闹）和双盈市场（一周开放七天）都有专门卖旧书的地方。

在旧书市场上采购文革日记特别需要耐心，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有时却一无所得。一般来说，文革日记本其貌不扬，散乱在旧书丛中很不起眼，但越是装

帧朴素的旧本子，越需要认真对待。有塑料皮的漂亮本子，大都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产物，即使有内容，也往往与文革主旋律关系不大。

在各种文革日记中，成套日记的价值要远高于单册日记，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单位文革的过程变化；在生活日记和工作日记之间，工作日记的价值又高于生活日记，其中往往记录了各色人物在运动中的发言摘要。

粗略浏览文革日记，不难确定作者的身份。一般来说，充当“革命动力”的作者写的日记要比“革命对象”的日记内容更为丰富。比如，中学红卫兵日记的价值往往高于中学校长日记；群众组织头头的日记，往往比观潮派的日记内容丰富；专案组成员的日记，价值往往高于专政对象的日记。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说法，例外情况也很重要。我曾访问过的一位学部老师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坚持写笔记，虽然最后还是被发现和抄没，但有一不起眼的小册日记本夹在书中成为漏网之鱼。王行国的《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载《记忆》第72期，2011年6月30日）是在劳改队被专政的险恶情况下记录的时代证词，文献价值是任何回忆录或访谈录所无法替代的。

从时间来说，我感到最有用的是文革前期的日记和1970-1971年间的日记，“九一三”事件后的大部分日记充斥学习中央文件和马列主义经典的笔记，还有不少中医中药、诗词歌赋、名言警句或民间小说（所谓手抄本）的摘抄，史料价值相对低得多。

文革初期工作组派出前后的记载之所以宝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这一时期各单位群众立场明显分化，并成为日后派系分野的源头；二是因为党委或工作组对群众分类排队的资料、工作组组员日记大部分被销毁——如1966年11月12日《陶铸同志在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的讲话》中要求，“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材料处理掉，烧掉”；周恩来11月27日接见全国赴京部分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时，要求现在将工作组整理的材料“封起来”，“等大家回来，首先是左派学生回来，共同协商，一烧了之。”而文革小报当时尚未流行，大字报资料也未必都进行了抄录和归类整理，整理了也可能被烧掉，所以党委或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的资料相对欠缺。

1970-1971年间的日记之所以特别可贵，也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1969年10月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发出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迅速下发了经毛泽东和林彪“批阅”的《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紧急指示》。按照这一指示要求，上级的指示、命令、决定，其他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要严格按照规定范围传达。规定传达到哪一级就只能传达到哪一级，规定在党内传达的不能向党外传达，规定在干部传达的不能在群众中传达，规定在军队中传达的不能在地方上传达，规定原原本本传达的就要原原本本传达，规定不要原原本本传达的只能传达精神。个人不许以封锁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借口，要求传达不该传达的问题。上级发的机密文件、负责同志的讲话（包括录音）和重要会议的记录，未经批准，一律不得翻印、复制、抄录和散发，更不准扩散到社会上去。因此，信息变得非常闭塞，运动的领导不再像以前那样透明了。而1970-1971年的个人日记中往往留下了当年的传达记录和会议记录（如周恩来、谢富治或更小一些人物的讲话），这对理解运动的轮廓非常关键；其次，清查“五一六”分子既是文革的继续，也是对前期群众造反运动的一个总结和“反攻倒算”。围绕此前发生的群众造反运动重大事件和重点人物，各单位组织了强有力的专案组进行调查。因此，从日记中往往能看到此前一些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关键活动的线索。曾任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德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北京市又把当年的造反派和“五大领袖”“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口述，朱佳木整理《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75页）他的口气如此轻描淡写，但仅就文革史的系统调查来说，清查“五一六”分子形成的文献确实是最系统完整的，“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离事实并不太远。

当然，对于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期的日记，使用时需要格外小心。因为整个运动以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目标，以延安整风时的“审干九条”为指导纲领，“逼供信”在全国范围盛行。在专案组的长期逼迫和诱导下，大部分重点运动对象都有被迫虚构事实的经历。所以，该时期材料的可靠程度，要根据内容的前后一致性和前期文革的背景来判定。

除了以上方面，文字书写好坏也是影响文革日记价值的基本因素。不少日记字迹潦草，读起来相当困难。糟糕的文字书写会挫伤阅读的兴趣——只是在收集了不少日记之后，我才明白这一点。

2011年12月23日初稿

2012年1月11日定稿

---

## 【昨日心迹】

# 日记中的大字报信息与马路新闻

王 林

按：这是原天津市文联老作家王林（1909—1984）的日记摘录（由王林之子王端阳整理、自印。《记忆》曾于2009年第23期摘发过一些片断）。王林是河北衡水人。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文革爆发时是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等。文革中，王林一方面作为受批判的作家要不断进行检讨，另一方面作为老共产党员，又要不断鞭策自己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因此对文革形势变化十分关注，在日记里记载了许多当时街头大字报传抄的首长讲话、传单小报内容及各种小道消息（有的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实传闻），从中很能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气氛及舆论主潮，对于研究文革历史颇有参考价值。本刊特摘编若干内容提供研究者参考。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1967年——

1月1日

元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首都。

读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哲学基础——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的又一个生动的罪状。

下午到天安门前转，最新的标语是炮轰叶剑英和赵尔陆的。有一辆宣传车带着时传祥示众控诉，牌子上写着：刘少奇的反动工具。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宣传车广播刘少奇的罪状。

六中（原艺文中学）门外有揭发本校纠察队王冒明（全总办公室主任之子）、朱支前（朱理治之子）大字报，说他们是西城纠察队重要支柱之一，私设公堂、劳改所，非刑打死同学王光华、退休老工友等，公安部逮捕他们后，陈伯达同志

曾亲到现场看所谓“劳改所”和地道。（有人揭发他们挖通向中南海的地道，阴谋刺杀首长。）大字报说他们为首的三人，逮捕后又释放，释放后又骂人、打人。

这个大字报前边的罪行和后边的处理，存在着矛盾。那么大的罪状，逮捕后又怎么能轻易释放？

天安门前华表上贴着王光美给苏加诺点烟的照片，丑甚！

李伟、石维坚二同志来谈，去上海火车不通，又说上海工人分两大派，斗争很尖锐，谣言甚多。

## 1月2日

精读社论，读戚本禹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矿院讲话，他说“秋后算账”是王任重提出的。

## 1月3日

到华北局看大字报，华北局革命群众对李雪峰、解学恭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检查不满，大字报甚多。

各大楼成了各地来京造反者的联络站和宿室。

中央组织部不许外人看大字报。

今天街上新标语是炮轰国防工委聂荣臻。北航“红旗”根据江青同志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清华的谈话写出大字报：“红海洋”（满墙涂红写主席语录）是大阴谋。

## 1月8日

今天首都批判刘邓联络站预定在天安门前开大会，我和大刘（注：即作者之妻、电影演员刘燕瑾）转了转，红旗招展，声势浩大。那么宽广的天安门广场都显得小了！从服装上就可以看出哪是本市群众，哪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群众。

回来路过六中（原艺文中学）门前，今日比前几天，六中更热闹了，成了展览馆，展览西城纠察队的罪状。被纠察队打死之王光华，他母亲有六间房子，出租，因而当作资产阶级狗崽子打的。退休老工友，当过洋车主，剥削过洋车工人。又打死了一个外语教员王某。王的父亲当过伪县长。

有起义的纠察队员揭发王冒明、朱之前等说：他们的口号就是父亲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张口就说革命的站起来，不革命的滚开！对其它红卫兵组织一律视为不纯，排斥打击。对自己也毫无民主作风，一言堂。

晚五点半返津。

## 1月20日

街上转抄的大字报，说唐平铸、胡痴已被新华社揪出。罗（瑞卿）再度畏罪自杀，已死。薄一波自杀，呜呼哀哉。邓小平、杨秀峰自杀未遂。

今日最新的大字报：十九日陈伯达、江青同志讲话，说刘志坚的后台老板是萧华。附有萧令杜平给上海的四点黑指示（十五日的）。

铅印传单说由西城、东城、海淀中学红卫兵纠察队所成立的“联动”，曾一度纠合两千多中学生到公安部捣乱，现将其首“三平”（项东平、邹建平、赵占平）捕捉。这些中学生，传说那一天带着行李到公安部要求跟被公安部拘留的纠察队难友共患难，并且带了很多礼物去“慰问”。

大街上广播车沿途宣传：……已夺权，布告安民。

## 1月21日

空军研究所大字报：今晨四时三十分周总理接见总参参加四清的干部，说昨日大字报（指说萧华是刘志坚的后台老板事）是造谣，说陈伯达同志是党的理论家，不会那样。可是昨天大字报也有江青同志的名字，没有辟谣。空军研究所贴标语抓政治扒手。

昨日关于萧的大字报后，还附有元月十五日萧叫杜平给上海解放军的四点黑指示。江在讲话里还说萧借病不参加文革，而到总政听汇报。如是造谣，也是知情者。

毛主席最近四点指示：

1、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戴了高帽子，抹了黑脸，洗了，继续上班工作。

3、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些好，还是团结少些好？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错误，还要挽救他，使之改过自新。不然，怎么能团结95%以上呢？

4、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的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使最难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后门大街大字报）

七机部四清革命造反联络站红旗战报编委会出版的元月二十日《参考新闻》上说：元月十三日《解放军报》社发生一次政变，为首的是唐平铸、胡痴，还有谷岩、宋琼。

政法学院学生陈明远伪造毛主席诗词：《革命岂能做井蛙》、《庆贺第一次核试验》、《庆贺第二次核试验》、《归舟中迎日出》、《平生爱大海》、《再访十三陵》，已逮捕。

十五日出的上述《参考新闻》说最近刘少奇要向党中央索回他的检查，说“如果那时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更形左实右。”

## 1月22日 星期日

毛主席最近（文化大革命中）对毛远新同志的一次谈话：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委，说是我说的，今后应该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辩证法，不懂得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了不起和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指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人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人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没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不过？开除太简单化了。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现象。你这样的青年人要多多的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揭出的，我写×××就是捅出来的。如果现在要我写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我到哪里都想

打听，都想交朋友。我们年轻人要学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问题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辩证法，这个用处很大。（根据北京工艺美术校接待站传单抄）

陈伯达同志一月讲话（北京抗大四中孺子牛战斗队翻印）分析真假共产党员。从这个讲话看来，以后党员必要重新登记。

《首都红卫兵》（三司出版）元月十七日出的二十二号全版发表了因为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而被打成右派，精神病人，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七次被送进精神病院，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又被秘密逮捕解押北京，非法审讯七个月之久。吃屎喝尿，装疯卖傻，送进北京安定医院（现改为红卫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他主治的医生金弘敏，也革命造反了，给他偷阅红卫兵文件，给他投寄给中央文革的信。元月七日王力、戚本禹同志亲到医院接见了这位同志——陈里宁，湖南湘潭人，一九五四年入党。

### 1月23日

中央文革紧急声明：十九日关于肖华同志的传单，完全是造谣。江青同志命令：保证肖华同志的健康和安全，送还总政。抄去的文件，送回。

从反面看，这紧急声明证明了谣言是“无风树不响”的。

陈伯达同志二十二日给蒯大富打电话说，调查康生问题“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行为，康生同志是反对杨献珍、林枫的”，又说高校“红战团”是反动的，现高校的大权在左派手中，不要叫“井冈山”兵团参加对此权夺权，警告蒯不要被坏人拉拢过去，要爱惜自己的声誉。蒯发出公告。

中宣部革命群众在院里正在斗争熊复。熊穿着呢子大氅，相貌也很像个官僚，湖南口音，戴着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大政治阴谋家”。革命干部追问他在陶铸下台后又布置了什么“没有陶铸的阎王殿”。

中宣部由阮铭派夺权后，另一派大揭阮铭，说他是亲陶派，假夺权。

长春自称左派者向公安厅夺了权，右派先集中千人包围武斗后，又联合东北各大城市工人做第二次的大武斗。有的工厂停了工。街上大字报呼吁支援。

据《天津红卫兵》披露，《天津日报》在社内外革命群众夺权互相斗争中。因此，天大“八一三”红卫兵和南大“卫东队”退出天津大专院校造反总部，而协同工矿企业造反总部和反修战士兵团砸天津日报社。“反修战士兵团”多系临时工、合同工，对天津五十多革命造反团体仿上海《紧急通告》而发的天津《紧急通告》大为不满，说“到口的鸭子”飞了！有的工厂已经准备根据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改为“长工”，见到《紧急通告》又不改了，因此他们大怒，他们说：“说句膀得力的话吧，我就是为鸟食罐来的！”

### 1月25日

二十三日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学校造反派组织座谈会上讲话：有许多单位从内部夺权夺得不错，夺得好。但是有的小单位到其它单位去夺权，你要夺，我要夺……是小集团夺权……在全市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应该是工农兵学商代表的形式，全面夺权。这要有个准备……搞一个全市代表委员会……搞一个权力机关，哪怕是临时的，比这样一个小团体，你夺过来，我夺过去好一些……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接管政权在中国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派人去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群众去接管。

陈伯达传达毛主席的话：“凡是闹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二十日北航“红旗”传抄）

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省革命群众代表时，对山西元月十二日夺省委、省人委等大权的举动，肯定得尚不十分热情，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二版社论专门推崇山西省夺权的“新的经验”。……

二十日陈伯达、江青同志电示北航“红旗”：“起草一个决定……准备北京市工农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不一定用市长的形式……工农兵都要派代表参加，哪一些可以接管，用什么形式，应经代表会研究。立即放吴德同志回去，监督工作，代表会马上准备工农兵代表会，不能交给这派，也不能交给那派。北京学生多，比例可以多一点，多搞主任，轮流主持会议……”

## 1月29日 星期日

谢富治副总理元月十七日对公安干部讲话：毛主席讲过，接管是不可避免的，主席他支持接管。主席还讲，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是很容易产生和保留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

又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毛主席昨天说了，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周总理前几天谈到有三种人：一种人跟不上，第二种人思想不通，第三种人反对。（《政法公社》铅印传单）

## 1月30日

街上大字报，说上海市曹荻秋剖腹自杀。王光美跳楼自杀，跌伤两腿。

从街上大字报看，新疆问题紧张。

人民大学红旗战斗队、长虹战斗队、首都红色造反者人民大学中队、永远红兵团、报卡社工人大队、“劲松”、“经风雨”战斗队、红旗公社二十七日印发传单，说人大“三红（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中的寇金和、鲁从明、赵遐秋、曹学明四人，是与党校“红战团”勾结着搞康生同志的所谓材料。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红旗战斗队等组织联合大会批斗寇等四犯，批斗后拟送公安部。“三红”出动大批人马打散了这个大会。

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队“向阳队揭老底”战斗组发传单，说元月二十八日凌晨解放军检察队依法逮捕了第四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的朱秀英。中央文革一再声明叶剑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硬说叶是刘志坚的后台。林副主席一再指示《解放军报》社不能冲，她硬要领着一帮人“造反到底”，非冲不可！

## 2月3日

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出版的《险峰》第七号（一月三十一日）简讯说：上海近郊有十几万农民进城，要求消灭三大差别，增加收入，并占领上海市组织部，这是阶级敌人策划的又一个新形式大反扑。

山西太原前第一书记袁振、副省长刘格平、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山西夺权斗争，受到《人民日报》和中央的表扬，但是山西有一派人借此大造谣言，说他们是政治扒手，要组织“第二司令部”，推翻已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造反》报编



辑部的文章《坚持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从昨日发表宋任穷、潘复生等在黑龙江大会上的讲话看来，山西的大方向没有错。

今日《参考消息》转载东方社东京一月二十七日电：日共十大（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前的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元月二十四日向野坂递交和发表意见书，指责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冈正芳等为修正主义叛徒。文长二万四千多字。

日共修正主义纲领说：“如果能够在国会中拥有稳定的过半数，就能够把国会从反动统治的工具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使革命的条件更加有利。”修到社会民主党考茨基上去了！

德新社东京元月二十三日电：日修借口人民大学二十二日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批评日共修了，宫本显治大反毛主席。《产业新闻》报道，宫本显治二十三日下午在日共大阪府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去年三月，以我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日本方面主张在共同声明草案中应该加进去，苏联虽有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因为它援助北越，因此，应该包括在反帝统一战线之内。”最后起草了“同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声明的草稿。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组成反美、反苏的统一战线”写进共同声明的要求，终于没有搞成共同声明。路透社东京一月二十九日电：由于《赤旗报》攻击了中共主席毛泽东，住在北京的十名日共党人已退出日共，其中有德田球一夫人。

《人民日报》三十一日发表、《解放军报》二月一日转载的《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作者是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孟繁华。王力同志问清作者后，立刻打发汽车接到了《人民日报》社。

## 2月5日 星期日

周总理三十一日二十一时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解放军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工厂和机关的代表时说：“董必武同志亲自叫他的小儿子董良国到公安部投案。家庭教育不好，学校教育不好，用这样的方法教育好，希望使他们成材。”

又说：“北京军区，彻底批斗杨勇、廖汉生是对的，但不能扩大化，把一串一串都串起来，这样不利于团结，重犯我们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杨勇的阴谋就是要一锅清水搞浑，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根据空军政治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打印稿转抄）……

新北大文革驻津联络站元月二十四日发表声明：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伙同反革命组织即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红战团”炮轰康生同志，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又批评他们实际上已经堕落成天津的“西纠”和“联动”。说他们根本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根本不依靠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无视革命群众的力量，包办代替，独断专横，要企图一揽天津市的党、政、财大权。

二十四日晚十时半新北大宣传车经过天大门口时，被天大“八一三”红卫兵二三百人围住，砸烂车上广播器材，绑架新北大和天工“八二五”五名战士。

二十八日由解放军后字二五三部队红色造反兵团领衔，联合天津劳二半八一八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二十五个革命团体发出《就天津市文化革命形势告全市人民书》，要求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队”等撤离天津日报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公安局等单位。

但是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队”方面的宣传品尚未见到。

## 2月6日

朝中通讯社奉命辟谣，说中国红卫兵大字报所谈的朝鲜政变问题，完全不正确，且带有“抗议”口气。

## 2月7日

一月二十一日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刘桂兰、张力生带一批工人群众向中宣部夺权，并冲击了《红旗》杂志社。二月一日陈伯达、王力、关锋等谈话要他们退出，并批评他们冲击《红旗》杂志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宣传机关。从上述负责同志的谈话看来，是中宣部文革主任阮铭勾引他们来的。阮铭本人还在抵赖。有些大字报揭发阮铭，阮铭曾被陶铸封为“坚定的革命左派”。

路透社东京一月二十七、三十日都说日共野坂参三攻击我红卫兵，并强调日修的“独立的立场”，话外有音。

日共山口县委（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一月二十日评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开展群众斗争和党的建设的新阶段》。看来这个县委要成为日本革命的希望。

谢富治副总理二月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大会”上说：现在造反派中有的不大团结，卫戍区司令部是支持造反派的，现在每天都有造反派之间打架，都要请他们去……（《全无敌》第二号，卫生系统铅印小报）同刊消息：中央文革元月二十九日给上海打紧急电报，指出上海红革会最近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指向中央文革的错误。但上海红革会中执迷不悟的人认为这电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继续播送《十二问张春桥》。

## 2月9日 农历春节

冒雪看大字报：陈伯达同志二月六日在北师附中讲话：初中、高中、大学都要复课。国务院二月三日出布告号召出外串联师生十五日内返回本地。

大庆油田造反派正在联合批斗王进喜，通令全国不要再称“王铁人”而称之为“王铁杆”。

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元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传达）：

1、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经介入（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形势下，在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2、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本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3、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4、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接好业务，保守国家秘密。

## 3月12日 星期日

读三月三日戚本禹在人大的讲话。讲话中说：“关于罗瑞卿叛党的一些内部材料，有一个单位把它印成书，一毛钱一本。印度大使馆用三毛钱买了三本。这

些机密都是敌人用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都买不到的，一毛钱就买去了。”这种现象，非叫孩子们注意不可。大刘说周总理二月十七日给财贸口各革命造反派的讲话，很快就传到美国特务机关去了。周总理为此很生气，以后不许再随便公布他的内部讲话。

#### 4月11日

大刘说郭兰英参加了北京“三司”，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有一派革命造反派不许她带，要求“三司”开除她，围攻她。她带着十几个演员到工厂去演唱，工人群众要求什么就做到什么，颇得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一派说她是到工厂捞政治资本，在天安门广场游斗她。她不服，精神抖擞。有的工人见到她被游斗的情景，写大字报支援她。据说是北航“红旗”“狠砸三旧”派进去点火的。

#### 4月22日

今天街上出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北京市革委会宣言）：“你们的宣言没有棱角。牛为什么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个宣言就是要让你们上台，让他们下台。要有气概，这是震动大地的事情。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有气概。这不是上海的宣言，这是北京的宣言，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可以参考《共产党宣言》。理论上要有东西，要有文化大革命。你们的宣言，要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宣言可以向你们学习。”

“从革命委员会成立，把批判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你们还不大做文章，要全面宣布刘、邓、彭、陆、罗、杨的罪状，从你们这里突破一点，大做文章，宣布彭、陆、罗、杨的死刑。要讲一些道理，还要有些具体东西，把最不宣布的东西写进去，放开手脚，大胆写。”

没有具体日期。刘、邓下没有写陶铸。

萧华同志三月二十一日报告中说邓小平在红七军当政委，打仗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信给警卫员，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揭发此事，罗瑞卿告发了，邓小平把莫文骅打成反党分子（去年十一中全会上平反了）。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小组会上，我（萧）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邓小平不发言。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

#### 4月26日

《文艺批判》创刊号（四月二十日）报道：四月十六日戚本禹同志到中国京剧团指示：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兵团是革命组织，不要冲击，他们在戏改中是紧跟江青同志的。又讯：四月十六日上海舞校到达北京……上海有人要轰《白毛女》，戚本禹同志说：我们请他们来演出，并且我们都去看。昨天各报就登出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观看芭蕾舞《白毛女》的大照片。这是毛主席用这种方法反对无政府主义。

上午到南大、天大看大字报。大字报中有周总理等审问青海事件的主犯赵永夫、王昭等的记录。赵是正定人，给国民党当兵，后到南京国民党军校教导纵队学习。大概是抗日战争中参加八路军的，开枪打死革命群众二百多人。

另一大字报是抄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乌兰夫“三反”问题给华北局的报告。有个大字报说毛主席对北京革委会宣言的批示，蒯大富证明是假的。

#### 4月29日

读江青、陈伯达、康生、周总理等接见“联动”被捕小头目时的讲话。接见中学红代会是四月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江青同志说：“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周、陈、康、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伯达同志谈到请罪问题，江青同志说：“主席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周总理说：“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的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的毛著。后来她回八一学校成了造反派……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毛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要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思想。”

#### 7月30日 星期日

傅崇碧同志七月十三日在军代表会议上引用毛主席的话：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要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要恢复，各级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谢富治副总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公安部和政法公社欢迎谢光荣归来大会上讲话：“毛主席号召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但是，由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多数是认识问题，坏的是个别。”

杨成武同志六月二十日讲话：“林副主席一九六五年四月教育我：‘人与人的关系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同志关系，除此之外无别的关系。’这是在庐山会议时那次，我没去，总理打电话要我留在北京，会后林副主席给我讲的。一九六五年和罗瑞卿斗争，上半年又讲过一次。讲的多深刻！林副主席还讲：‘观人先观其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六十一个叛徒集团名单拿出来就知道了，他们六十一个，每年照一次相，聚一次餐。看他的朋友，大体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主席司令部的，还是什么。深刻呀！深刻得很！”

康生同志七月十九日传达：“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向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前些日传说刘格平一派与张日清一派矛盾的标语，出现在北京大街上了。

大刘二十七日来信说：北京有这样的大标语，为什么总政负责人不到机场去迎接谢富治和王力同志？又说：北京正在游斗彭德怀。

#### 8月5日

毛主席关于“八一建军节”指示：

“八一”不能改。这是重要的一天。

我们打响了第一炮，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这个问题是历史。历史是不容颠倒的。有人说南昌起义是朱德、贺龙搞的，其实起作用的是周恩来同志、林彪同志、聂荣臻同志、刘伯承同志。

毛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

“罗瑞卿的问题同我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实际上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参谋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大搞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他总是要拉几个人在一起。”（这个批示从口气上看，好似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

## 8月30日

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已正式成立，并贴出通告。公告九月开始执行协定。看来，要发生作用，但是曲折不会没有，阶级斗争么！

大字报：毛主席批准发给延边造反派一千支枪，因为军分区支持延边的保守组织，保守组织压迫革命造反派甚厉害，延边是朝鲜民族自治区，情况一定很复杂。

## 9月1日

毛主席最新指示：“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陈伯达同志说：“现在看来，乱得差不多了，可以治了，法国革命一年，俄国半年！我们一年多了。”

毛主席接着说：“乱得还不够，还要乱。‘百万雄师’一个也不准抓，要让群众自己造反，内部造反才可以抓。”

谢副总理汇报北京工人运动的情况。

主席：“最近有人说，这派革命，那派不革命。我就不相信，这派就那么革命，那派就那么不革命，都是工人嘛。”谢：“不能怪工人，要怪领导。”主席听了点头微笑。

主席：“现在有些乱，不乱透，不乱够，问题就不能解决。”

主席：“要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八月十六日，中央决定武装北航“红旗”战士，发枪成立民兵师，又决定武装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十八日北师大隆重举行“文攻武卫、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会”。

《东方红报》六十七期（八月二十二日）载周总理八月二十一日讲话：“斗争武汉陈再道，让他坐飞机，我们的最高统帅不满意，说那样不好。”

## 9月5日

有从北京来的人，说北京街上有炮轰林杰的大字报。林杰是《红旗》杂志的

副主编，一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笔杆子”，怎么也出问题了呢？

据传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写了赵易亚（解放军报）的大字报，联系上关锋，又联系上林杰和谭厚兰（夫妇），三军抄了他们的家，抄出他们整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黑材料。不知真假，姑妄听之吧。

## 9月7日

街上大字报：九月四日江青等同志接见九个院校革命派时说：林杰、赵易亚、穆欣是反党小集团，“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是徐向前、叶剑英。林杰是萧华安置在《红旗》杂志的私人等等。（这个大字报，是天津体育公社写、贴的）

## 9月8日

街上转抄的戚本禹同志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过一两个月，要发动群众对杀人、放火、抢劫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人大加检举，并戴上“法西斯”帽子。这个大字报围着抄录者，从晨到晚不绝。

---

### 【昨日心迹】

## 大串联中了解到的大饥荒

郑楚鸿

按：本文由《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年 11 月初版）一书作者唐金鹤提供，内容见该书第 515—516 页，原录入时对其中提到的时间有误植，现为核实修订后的文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修订版还在搜集各方意见继续修订中。

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清华大学“向工农万里长征队”的步行串联。1966 年 11 月 28 日长征队在天安门宣誓出发，首先走访白洋淀和邢台地震区；然后从东麓爬上太行山，到达林县红旗渠；穿过整个黄泛区，1967 年 2 月 7 日到达淮河边上的风台县。在 72 天里用双脚走了三千里路；他们坚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访贫问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听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有关文革前大饥荒年代饿死人的情况。郑楚鸿将这些日记封存了几十年。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而原本只想让红卫兵通过“大串联”把造反之火燃遍全国的毛泽东，决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的后果……

## 1967 年 1 月 29 日

到达安徽省原墙集（电子地图上查明现为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原墙镇，约在东经 115 度，北纬 33 度）。串联接待站的干部说：“皖北这一带，60 年饿死了很多人。严重的如太和县，有的村子饿死了六成人；许多村子死一半。”不过，他们强调：“这是下面的干部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搞糟了；毛主席爱人民，知道晚了，才死人。”

## 1967 年 1 月 30 日

到原墙集东南三里的腰庄大队蹲点三日。今天上午与大、小队干部座谈，他

们说：59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是，丰产不丰收。青壮年都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村里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干部吹牛皮，亩产200斤，但报上去亩产600斤；上面就按报上去的产量统购，交不出粮食来，就派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到60年的3、4月份，就没饭吃了。耕牛没喂的，死光了，连牛皮都吃了；地里的草吃光了，树皮剥光了，老鼠捉光了；饿极了，割路边死人的肉吃。听说邻村有父母将闺女勒死吃肉的。人一个一个先浮肿，然后倒下去，就死了。腰庄的情况算好的，全村98户，400多口人，只死了三成，100多人。

## 1月31日

今天与房东和几个青年聊天。他们听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回来探亲，将饿死人的情况向上面汇报，中央派人来调查。村里的干部将浮肿的人赶到村外藏起来，派一批干部家属（他们没挨饿，油光满面的）去食堂扫地、排队打饭作样子，糊弄过去了。不过，这批干部很快就露馅了，被法办了好几个。61年，这一带搞了一年多的包产到户，大牲口、大工具公用，地一起耕、播、收，但分到各户管理、施肥，年终打场一户一垛，超产归己，亏产要赔；劳力多的下死力干，劳力少的可让地（相当于出租），生产一下就上去了。但这种做法被批判了，加上62至64年三年受灾，这一带又失收了。不过，因为在上面挂号了，国家年年派救济粮，保证每人每天有八两口粮，比起60年没饭吃，社员们都很知足，都感谢毛主席。

## 2月1日下午

我们在一个四面漏风、快塌了的土房里访问一个19岁的姑娘阮海玲。60年，她家饿死的人最多，原有六口人，只剩她一个。她如果不是到外村当童养媳，也活不了。她的亲人，就在路边割死人的肉吃，都死了。婆家对她不好，她逃了回来。她的人很麻木，呆呆的；我们提一句，她答一句；提到父母死、兄弟死，她无声地掉眼泪。

我们住在社员的土屋里，四壁空空。房东的被子又破又薄，上面盖着几个化肥袋。吃派饭时，优待我们，一个烤焦的杂面窝头（不知道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可能有地瓜粉，地瓜叶子，野菜等等），在窝头的洞里放一个大红枣，这就是当地最好的伙食了。

## 2月10日

中央通知，停止步行串联。为了与最穷的黄泛区作对比，我们自费坐火车，到无锡附近的乡村，访问了几个村子。

## 2月27日

回到清华。

---

## 【昨日心迹】

## 湖南一中专学校学生日记摘选

任冬林整理

按：这是任冬林先生从废品堆中淘得的一部日记，从日记内容可知，作者系湖南长沙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出身好”（大约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在文革初期曾参加保领导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因中央支持造反派，否定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类保守组织，他也随之“反戈一击”加入了造反派。不久毕业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日记反映出，他的思想在文革中跟着“主旋律”的宣传鼓动而不断变化，但并无出众的表现，只是一个“随大流”的普通人员。他记下的一些自身经历及心理感受。颇有代表性。

1966年5月16日 星期一 阴

**坚决打垮邓拓黑帮**  
**——读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后**

战斗号角已吹响，  
革命战士上战场，  
挥舞笔杆握紧枪，  
瞄准黑线开火忙，  
决不松懈意志刚。

人民警告邓黑帮！  
若不缴械来投降，  
坚决打倒黑心狼，  
你死我活拼到底，  
高举红旗永跟党。

**坚决拥护党中央英明决定 1966年6月18日**

看到报上刊登了党中央关于取消高考制度的决定，使我不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胜利之一，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全国革命师生的心愿，是文化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他将表明一切封建制度与牛鬼蛇神的灭亡和失败。

层层考试的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延续，它在教育战线上撒下了不少的毒药，它是文化革命道路上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它使学生陷于考试前繁忙的复习中，陷于背条文死读书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心只想成名成家，追求个人小家庭收音机、小汽车、洋房等。剥削阶级和一些思想觉悟没有提高的人，由于钻研，成绩好，都考上了，有继续读书的机会，但结果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不问政治，埋头于业务、技术，放弃了阶级斗争，让资本主义复辟有了条件，而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思想觉悟高的人却因底子薄成绩差，而考不上学校，无深造机会，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能永远后继有人，培养出来的只是些背条条，死读书和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这样的教育制度不改革取消行吗？不行！不行！

现在党中央取消了这个制度，使我心里万分高兴。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这次大革命运动中，坚定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拨开迷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这部照妖镜、显微镜、望远镜去辨别牛鬼蛇神，用这锐利的武器，向牛鬼蛇神狠狠开火，永远在革命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1966年8月26日

今日回到了长沙，听到了关于“8.19”湖（南）大（学）同学的事件（注：指8月19日湖南大学部分学生到中共长沙市委鼓动造反时与党政干部及“保守派”群众发生冲突的事件），也了解到长沙斗争的激烈，我决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来，我坚决支持湖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省、市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什么不可以呢！宣传毛泽东思想好得很，就是好！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要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1966年8月27日

来到衡阳，抗议地委制造群众斗学生的流血事件，支持（湖南）矿冶工程学院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

1966年8月30日

从衡阳回来，就一直上北京，我终于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北京了。毛主席居住着的地方，我多么的向往您啊！我终于见到您了，我达到了我的心愿，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激动啊！

下了火车，我们就游行。满满的一火车人都是湖南来的，我们强烈要求中央首长接见我们。下午，我们召开了大会，安排了住宿地方，就到处游玩去了……

1966年8月31日

上午我们召开了大会，最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传来了——下午2点后，中央首长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我们，我心里一千遍一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下午两点钟，我们整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五时（40）分左右，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坐着车子绕广场一周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全体红卫兵、革命群众和师生。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今天（终于）见到了您，这是我最最幸福的日子，我激动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您的身体那么健康，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幸福，见到了您，给我浑身增添了无比的革命干劲，我永远也记得今天。我决心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跟您干革命，我要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6年10月20日

在这几天中，我们红色政权保卫军召开了一次“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誓师大会”，会上，刘爱华发了言，我觉得她的发言是十分错误的，轻易地为张平化这个革命的绊脚石下结论。他的“九.二四”报告影响极广，极坏，阻碍了革命，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他根本不是什么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干部，刘爱华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十分值得考虑，值得深思，可惜还是一个负责人呢……

“九.二四”报告至现在，到处出现了抓右派“黑鬼”运动，还说是红色政权保卫军抓的，这确实是一原则错误。我还听说“八.一九”也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围攻湖大革命师生的，我想这都是不对的，怎么能够群众间互相斗争呢？这是

省委利用控制红色政权保卫军，达到他的阴谋，这个错误是不小的。我很想不在红色政权保卫军里了，但是，我想到我校的组织没有干什么坏事，同时它是一个群众组织，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改正，我们只能努力把它搞好，我就不退了。

### 1966年11月12日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同学们出去串联了20天，大致情况如下：

10月22日到武汉汉口；

10月25日到郑州；

10月26日到南京；

10月28日到上海；

11月5日到杭州；

11月7日到南昌。

### 1967年元月19日

我和其他同学们一道由组织上在月初踢开总部，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们原来的战士和一些原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狂飙造反独立兵团”。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向革命造反派学习，以前我们受了骗，起了保守作用，使我很心痛，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却干了相反的事，认不清敌友，上了坏人的当，这给了很深重的教训，使我更加清楚以前我的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在脑子中扎根，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清形势，突出政治，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决不能上敌人的当。

### 1967年元月24日

我听到了周总理对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的结论（注：指周恩来于1967年1月22日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的：“‘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全国工农兵红色夺权司令部’、‘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中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这些组织中首恶分子。”），我感到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我也十分痛心，我对着毛主席像哭了一场。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工农兵子弟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心里的红太阳，我们对您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我们的心愿，就是要誓死捍卫您，永远跟您闹革命。可是，可恨的张平化之流利用我们的缺点，“认不清敌我”，我们走上了邪路，我们今天醒过来了，我们要造反，造张平化的反，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反，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们保证改正错误，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个人思想中的毒素，永远跟您闹革命。

毛主席啊！是您救了我，我以前由于没有把您的著作作为指路灯，没有用您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坠入黑暗的泥坑，今后我一定牢记林副统帅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我警告张平化之流，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企图毒害广大工农兵子弟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的阴谋诡计必将彻底破产，我们一定坚决与你斗争到底，你们只有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如要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我一定痛改前非，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红色政权保卫军”！

打倒张平化！  
打倒铁杆保皇分子！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1967年8月10日

转眼间半年了，可是半年来我的历程都是不堪目睹的。自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以后，我很苦恼，心情是烦躁的，为什么老是站错队呢？为什么老是认不清形势，赶不上前进的历史车轮呢？

我感觉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根，它在那里兴风作浪，在捣蛋，它使我晕头转向，在沿着那危险的通向万丈深渊的道路上往下滑啊！多么可耻，它险些使我粉身碎骨。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辉，给我指出了光明大道，我在斗争着，我要战胜那可怕的恶魔，我要反戈一击，把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到十八层地狱下去，永远坚定地跟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 1967年11月18日

在学校里我很好的进行了检查，挖了思想根源，认真进行了学习，前一年以来完全是自己的思想毛病，差点叫修正主义拉过去了，好危险哪！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再一次挽救我们，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过头来，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闹革命！

现在学生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即将走上新的岗位上去，为中国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一定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努一把力，改正错误，学习好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搞好工作，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老工人学习，兢兢业业。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1967年12月1日

我们走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邵阳汽车修配厂，工人的生活代替了学生的生活。但我要牢记，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掌握好毛泽东思想，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苗头连根拔出，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前进的灯塔。

### 1968年1月1日

光辉灿烂的一九六八年来到了。

在这新年的节日中，让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火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一九六七年，我干了些什么呢？想起来，我很难过，还是让它成为历史永不回头吧！我要在新的一年里开始的时候，做好计划，在这光辉灿烂的一年中夺取“斗私”的胜利，把“批修”的这一战斗任务，打得更出色！

指南：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

灯塔：是光辉的老三篇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一定要从伟大的毛主席著作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沿着毛主席指

引的航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永远前进，奔向那光辉无比的明天！

**1968年1月15日**

工作始终没有变动，使我感到苦闷。同学们都变动了工序，可是我呢，还是这么按开关，我很想不通，这怎么能学技术啊！我很羡慕同学们，他们真幸福。由于工作不安心，师傅对我关心，了解我的原因后，耐心的给我解释，安慰我。当早上学毛着时，我读了《纪念白求恩》，更加使我要安下心来了，白求恩同志对工作精益求精，我呢？却挑这拣哪，不是为了把工作搞好，这不是“私”字作怪吗？这不是单纯为了学技术的思想作怪吗？找到了恶根，使我浑身痛快，我决心学习白求恩，兢兢业业的埋头工作。

**1968年1月20日**

春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在厂里工作也将近两个月了。但在这两个月里，我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很少有成绩，而缺点却有一大堆，我觉得自己没有进步，我很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仔细的挖思想根源，主要的是头脑里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头脑里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很危险的。以前自己一再向自己提出要求，但总是这样滑过去是不行的，我要牢记在心里，坚决改正错误，争取进步！

**1968年2月6日**

春节过去，在回家的日子里，心大概又分散了一些吧！现在就要把心收拢来，安心生产、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切切不可忘记，一定要把工作搞好，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968年2月25日 星期六**

**“革命委员会好”**

资江两岸红烂漫

邵阳地区尽朝晖

雪峰山在欢笑，资江水在歌唱，邵阳市成千成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欢呼：邵阳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邵阳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邵阳地市革委会成立了，她为邵阳地区人民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撑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一定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粉碎一切敌人的阴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1968年3月1日 星期四**

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诞生在各个单位，我厂的革命委员会今天成立了！这是我厂全体革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是毛泽东思想在我厂取得的伟大胜

利！

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我厂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全体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坚守生产岗位，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建立革命新秩序，形势越来越好！

在这大好形势下，我要牢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搞好工作，为人民立新功。

#### 1968年4月1日 星期一

来厂工作已有四个月了，但是我取得了什么成绩呢？可怜，我想起来心里似乎有点胆寒，太微小了，简直可以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可是我用我的双手去为祖国做了些什么呢？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我决不能辜负，我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给祖国干更多的事，牢记啊！牢记要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 1968年4月8日 星期一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我省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她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们湖南三千八百万英雄人民永远紧跟毛主席，英勇战斗，取得了胜利，我们个个振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

今天，我厂也举行了盛大游行，热烈祝贺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同志们个个喜笑颜开，说这样一来，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只有不断取得胜利，打垮一切“左”“右”的敌人，把毛主席的家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了光辉的一页，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把我省办成红通通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贡献自己的力量。

#### 1968年4月9日 星期二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委会的成立，发表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一切旧习惯势力的上层建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垮顽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堡垒，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沉重的打击，为我国永葆马列主义的青春永不变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她大大的促进了世界革命的前进，伟大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要高呼：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8年4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是我应该记住的一天，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教训，自己的粗心大意，把车床螺杆也碰弯了。这事不禁使我想到，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不正是不懂装懂而造成的吗？当然经历少，但是学问、知识自己不去钻研，不看，不问是永远也不会增加的。我要牢牢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万万不可自满自足，满足于一知半解。毛主席教导我们，对自己要学而不厌，我们一定要这样进行学习，以利工作，否则是有害于工作，也有害于自己！

1968年4月18日 星期四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发表了，这给美帝、苏修以十分严重的打击。美国黑人的这次对美国政府的进攻，给美国帝国主义打了一个沉重的响亮的耳光，觉醒的黑人勇敢地战斗，把美国首都华盛顿打得个稀巴烂，这是世界革命大大向前迈进的标志。毛主席号召我们，说要全世界的工农兵和革命的人们迅速行动起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我一定响应这一个伟大的号召，站在车床前眼望全世界，为世界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全世界受苦的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毛主席早在六四年十二月《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就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现在，毛主席再一次指出帝国主义的灭亡，世界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一定要眼望全中国，胸怀全世界，把世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苏修！

---

【昨日心迹】

## 滚一身泥巴的日子

——插队知青日记选

陈仁德

按：陈仁德，四川忠县（现属重庆市）人，生于1952年，忠县城关民办中学1968届初中生，1969年2月8日插队忠县复兴公社水坪大队（今复兴镇水平村），1972年12月20日结束知青生涯，插队时间近四年。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不间断，即使再忙再累再晚也要在油灯下写完日记才睡），现保存有1969年10月27日至1972年5月12日的日记，一天不缺。这是从中选出的部分。陈仁德八十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历任《三峡都市报》、《重庆商报》、《重庆青年报》等多家报刊记者、编辑、主编等，有《吾乡吾土》、《陈仁德诗词抄》、《云气轩吟稿》、《陈仁德文存》等多种著述，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 1970 年 9 月 27 日

公社通知我们去区里看战备教育展览，早饭后冒着大雨前往东溪，路滑极了，我们小心地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小路，经过 15 里路的里程来到了公路上，公路上就一点也不滑了，很快越过 10 多里公路，到了战备教育展览的所在地东溪区。看展览的人相当多，复兴公社来的人都在这里，等了一会儿我们就排着队去看了。展览分成几个部分，用各方面的事实说明了备战的重大意义，人们从展览中进一步看清了苏修美帝的狰狞面孔，更加仇恨苏修美帝及其同伙，从而使人们用实际行动来备战，随时将敢于来犯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看完了展览已是下午 2 点。

### 1970 年 9 月 29 日

吃过了早饭就开始走，到了公社刚开会。今天的会议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会议”，由公社主任叶真侯主持，会议阐明了辅导员的任务和辅导员的重要性，会后还进行了分组讨论，讨论当辅导员的光荣。姐姐（作者的姐姐陈琳插队在复兴公社水坪 4 队，作者在水坪 6 队）也代表四队参加了会议。会后回到水坪。

### 1970 年 10 月 4 日

大队召开干部会，我以学习辅导员身份参加，会上学习了县“三代会”的学习资料和复兴公社第三期“抓革命促生产”简报，要求干部们回队后进一步加强学习，在生产队掀起一个学好人做好事的高潮，把生产搞得更好，为夺取明年的大丰收打下基础。晚上生产队开会传达了以上精神。

### 1970 年 10 月 16 日

生产队今天开会，讨论如何搞好小春播种，争取胜利。我抽空把我的地瓜地挖出来栽上了幺姨寄来的红油菜（作者姨妈从简阳寄来的红油菜种子）。今天雨停了。

### 1970 年 10 月 17 日

从今天起开始出“早早工”，天不亮就起来煮饭，天亮就出工。由于月亮大，社员们误认为天已亮了，谁知吃了饭天还不亮。天亮后妇女们出工点胡豆，男的背粮下河，我队还有点什么粮没有上完。我们背完了粮，回转来进去掏干田沟，这些干田都是冬水田做的，水很多，加上近来的大雨，田里积水更多了，掏沟很不好办，锄头一下去便溅起泥水来，我们一个个搞得满身都是泥巴，连眼鼻嘴都沾上了，头发上也是的。一脚站下去，就陷入半尺多深，很不好干活。但我们耐心地细心地，还是把一条条沟理了出来。中午 12 点收工，饭后 2：30 又出工，仍是掏沟。

约 4 点时，爸爸意外的来了（作者姐弟插队地方离县城不远，父亲陈懋智常来看望），背来了煤球、面条、腊海椒等东西，我很高兴，因为我正缺这些东西。

### 1970 年 10 月 18 日

整天都是掏沟，搞得泥浆满身，真可谓滚一身泥巴，我们的口号就是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今天出工太早了，天还不亮。

### 1970 年 10 月 19 日

今天早上3点多钟，刘队长（名刘宗玉，作者著有《知青时代的队长》记述其行状）就喊社员们起来煮饭，还没到6点就出工了，完全还是属于黑夜，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整个大地一片雾气弥漫，几步以外就认不出人来了。我们男社员挑粪，女社员点麦子。但挑粪却看不见舀，只得跟妇女一道去出工，天明以后再挑粪。今天是点的干田，这干田干得像石头一样，挑着粪赤着脚在泥块上走，脚板像踩在刀尖上一样，实在痛人，但我咬紧牙关，不怕牺牲不怕疲劳，把这一天坚持过去了。我们要决心搞好小春播种，夺取来年的大丰收。今天点完了“公路”上的干田和“大地”的干田。

晚上回家看到肩头上的衣服已经被扁担磨破了。脚掌很痛。

### **1970年10月20日**

一早出工到马家沟给空地掏沟，我感到腰有些痛，但我坚持下来了。

### **1970年10月21日**

清晨，社员还没有出工，我和朱永安（水坪6队初中毕业回乡的青年农民）一道走到院子后的山包上，喊着话题进行山头广播（山头广播是当时农村常见的一种宣传方式，广播者每日清晨手执铁皮话筒站在山头上宣读毛主席语录或《人民日报》文章），宣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宣传毛泽东思想，然后出工，反正是点小麦。我对山头广播很感兴趣，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方式。

### **1970年10月28日**

出工在“羊角坟”挖红苕，我分得36斤，今年由于红苕受旱，差于往年，估计每人只分得200斤左右。

### **1970年10月30日**

队上不幸又病死一猪（70多斤），晚上社员每人分得肉3两，每斤价2角钱，我因填别人不要之空，共买了肉6两，蹄一支1.2斤折6两，连肉共1.2斤，价2角4分。

### **1970年10月31日**

今天出工挑粪到“阎王地”，点小麦胡豆，整整一天，似乎有点累人。中午去姐姐那里，把昨日所得之肉、蹄吃了，月馥没有吃肉，吃起来甚为可口。

### **1970年11月1日**

参加大队召开的党员、宣传员、辅导员会议。会议由刘书记（刘太生，水坪大队党支部书记）主持，主要是传达刚结束的区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搞好大批判，把批判刘少奇李井泉同批判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文革前受过处分的四川省宜宾市干部，文革中1967年4月由中共中央平反，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1969年底被中共中央以“个人野心家”等罪名打倒）结合起来，把一打三反运动搞彻底。同时还大力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学唱革命京剧，普及样板戏。下午出工点麦子。

### **1970年11月2日**

今天参加公社的辅导员会议，公社主任叶真侯主持会议，会上，东堡、天坪、



临江、凤凰等大队作了经验介绍，发言者用无数生动的事迹，说明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公社的小春播种已基本完成或正在完成，大会要求每个到会者把兄弟队的先进经验带回本队去，把群众组织起来进一步掀起学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会议结束后通知全公社知青明天开会，我想到明天又要来，不如今天不回去，于是我就到了离场比我近的向兴权（复兴公社金星三队知青，作者好友，现居重庆）家。谁知到他家时，他竟没有在家，远走几十里以外去帮社员扛木料去了，去的地方属石柱县万朝公社，山陡路滑，峥嵘崎岖，今天回不来了，大概得明天才回来（这是扛木料的规矩）。我无法进屋，只得准备另往他处。好在一位小孩想出了办法，他从门坎与双扇门板之间的狭小空间钻进屋去打开了后门（幸好后门没锁），于是我才荣幸地从后门进了屋。晚上我自己煮饭来吃了，然后上楼睡觉。准备明天同他一道去开会。

### 1970年11月3日

昨夜一点半钟，听见狗咬的声音，院子里出现了话语声，仔细一听有向兴权之声，不一会人声都集中到一间屋去了，只听见劝吃酒的声音，可能是在主人家里吃饭吧。吃过了饭，向兴权打开门立刻发现有情况（我装睡着了），便警惕着上楼来，一看床上有人，大吃一惊，后来看见是我，就放心地一阵大笑。他讲起他扛木料的经历，真是太艰苦了，一路都是摸着夜路走出来的。天又黑，路又烂，木料又重，人又疲，肚又饿，想起来都够受了。

天亮后吃饭，仍在主人那儿，我也跟向兴权一同去了。

饭后到复兴开知青大会，会议由磨子公社一位重庆女知青（重庆插队到忠县磨子公社的女知青李秀达）作她参加重庆首届“三代会”的传达报告，由公社李道权作他参加的县安置会议的传达报告，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多。

### 1970年12月1日

生产队在“大石盘”修公房，现在开始开山取石了，我主动要求担任了抬石头的重工。天亮就到工地，抬了几次才回屋里吃饭，我们抬石头八人和石工二人在一起吃集体伙食。吃饭后又赶着去抬，抬到下午一点多才回家吃饭，饭后又抬到天黑。这个工作算是重体力劳动了，千多斤的石头压在我们八个的肩上，我们前呼后应，努力向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每抬一条石头就流一次大汗，我穿的棉衣都浸上了汗水。有一条石头特别重，大概有1500斤吧，我们抬着万分吃力，简直是一步步移，由于过重，套石头的六股拧成一股的牛纤绳齐齐地断了，巨石一下掉下来，要不是人跳得快，脚都要打断。

我对于这样的抬石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本来队上不要我抬，但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我就向队长要求坚决参加。和我一道的另外七人都是队上的头等劳动力，都是二三十、三四十的成年人，只有我才18岁，初次尝试抬石头。经过了艰苦繁重的一天，肩和腰都变得很痛，确实是比做普通活路扎实些，但我并不叫苦，毫无怨言，我深深地明白，要干革命就得吃大苦耐大劳。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决心要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在艰苦的农村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 1970年12月12日

我又参加了修水堰(当时规划的从金星水库引水到天坪大队横跨全公社的水堰,每年都要开誓师大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至今未建成)。今天的工作是放炮炸石,一天都是在打炮眼。我队负责的工段大都是石坡,非用炮轰不行。我们连着打了六七个炮眼,安好了炸药,再一起点着,不一会就听见一连串的炮声,惊天动地震荡山谷,在起伏的山峰里长时间回荡,人们只觉得耳朵像震聋了一般。被炸起来的飞石飞到很高的空中,又像雨点一样砸下来,随着硝烟的消失,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爆破口上乱七八糟的石渣上,还留着刺鼻的火药味。我们劳动到12点的时候,送饭的人来了,生产队专门派人煮饭送饭,以促进水堰工程的快速进展。我们坐在乱石上吃过了饭,又开始了战斗。

### 1970年12月15日

今天仍然修水堰,这个工程确实艰巨,看来要想在今年完成还得下一番苦功夫。

我们生产队今晚开了一个社员会,讨论了一些问题,比如粉房(水坪6队建有粉房,帮县土产公司磨制豌豆粉,时近春节,豌豆粉加工任务重,不得已用人代替牛拉磨)问题。粉房的任务重了,牛力不够,决定用人加班推。用人来干牛活,这无疑是十分辛苦的,但我第一个报名,主动要求担任这一工作。我想我们经常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正是检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吃苦在别人前头,就应当毫不迟疑地把这个苦活干起来。会上还讨论了水堰的问题,决算的问题。另外,大队还通知我和生产队队长(正副)、会计一道去新阳大队开会,内容是农业学大寨,时间从本月17号到23号。会议据说还是由县里主持呢。

### 1970年12月16日

清晨约5点钟就起身开始推磨,这时月亮还高高地挂在天空。我兴冲冲地和“王四”、“平安”(“王四”、“平安”是水坪6队青年农民,王四是队长刘宗玉的儿子刘孝和,从小拜继给王家所以叫王四。平安名吴世成,小名平安)一起推动磨子,两人在后推,一人在前拉,三人一起踩着牛走的路转。我才走几步就觉得头很晕,好像站不稳一样,但我闭紧双眼咬紧牙关,尽量让自己坚持下去。和我一起推的“王四”、“平安”都能坚持,另一个磨子的三位女青年都能坚持,我还能坚持吗?我干脆脱了棉衣轻装上阵。我又推了不知有多长的时间,但脑袋一直很晕,不敢睁眼,只是埋着头勉强往前走。走呀走呀,转呀转呀,头晕得难以忍受,不知不觉速度慢了下来,但我仍在胡乱地往前迈。罗国平大娘见了这般情景,忙叫我停住不要再推,以免身体吃亏,同时也耽误了进度。我停住了手,只觉得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回到屋里一头栽到床上,再也不动了。这时大地还是一片月光。

天亮时醒来,正听见在喊“么佬”(“么佬”,王四的弟弟刘孝顺)来接班,原来我走以后,修德又接着推了一会,也坚持不下来,现在又喊“么佬”来推了。

忙着吃过了饭,我仍扛着锄头奔向了水堰工地。今天水堰上人很多,我队去了20多人。工地上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二锤声和人们吼着的号子声。

### 1970年12月17日

很早就吃了饭,一心急于前往新阳大队。谁知应该和我一起同往的三人都干活去了,刘队长还进城去了。我一时没有了主见,又不知天明还去不去,如他们不去,我一个人又咋办呢?我真对他们有意见了,他们又不向我说清楚,咋个去

法，带啥东西，他们去不去，哪时去，让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我一个人去开会吗？又不知带啥东西，走哪一条路，去怎么接头。又使我出不了工。我跑到四队去打听情况，又听说四队已走了，我心里很焦躁，好像满腔热情被泼了冷水，但我仍在家等他们三人回来，谁知他们回来后却只字不提这件事，我更急了。

今天我又耽误了一天生产，我对他们可真有意见了。

### 1970年12月18日

晨前被刘队长叫醒，叫我赶快吃了饭仍去新阳，并向我解释了他们昨天由于思想不统一而没去的原因，我也明白地向他提了意见。接着我很快煮好了饭，吃了饭就背着被盖、大米（注：当时农民包括知青外出开会若当天回不来，就得自带大米交会议伙食。有关规定叫“自带基本口粮国家补差”。公社社员的口粮由基本口粮、工分粮、肥料粮三部分组成，其比例大约是7：2：1。每人的基本口粮相同，工分粮和肥料粮则不同。如果一个人一年有200斤基本口粮，分摊到每一天就是大约5到6两，外出开会时就按照会议天数把基本口粮带去，然后由“国家”即会议主办方照每天一斤补足所差部分。一日三餐的定量分配好像是3、4、3）和刘队长向队长一起出发。路很滑，昨晚下了小雨。到了路上才又想起忘了带菜、碗筷等，但已无法了。由于路滑，我们选走了河路，一直走到赵家溪才开始上山，不一会就到了新阳大队。会场设在新阳四队李家嘴院内，会场上挂着一幅醒目的大幅标语“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会场上人很多，他们是水坪、天坪等六个大队学习班代表、新阳大队全体社员，东堡、水口、白云三大队部分代表。会议开始，由区革委袁有情传达省“三代会”精神，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后又由公社叶真侯主任讲话，讲述农业学大寨的重大意义。接着，新阳大队唐宗兰交代她自己猖狂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行，新阳大队□□□（没有听清楚姓名，一月后得知已经自杀身亡了。其人本是抗日战士）交代自己解放前担任国民党特务排上士排长，杀害共产党新四军的罪恶历史。最后会议结束。晚上我们开展了讨论，自己谈自己的思想，对这次学习班所抱的态度。

今天，我碰到了新阳的姜自英（重庆插队复兴公社新阳大队的女知青，下文的姜自华是其妹妹，同在一队），并通过她认识了落户李家嘴的知青郑开放，休息时我们一起在郑开放家耍，郑开放欢迎我到他家宿，我很高兴，晚上讨论结束后，我到郑开放家睡，和他摆龙门阵谈天。

### 1970年12月19日

大约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郑开放就起床煮饭，据说他们天天都是吃“早早饭”，天亮后郑开放留我吃饭，我谢绝了，因大队伙房已经给我煮好了饭。我回到学习班，人们都起来了，不一会就吃饭。饭后学习班又以大队为单位开展讨论，由到会人员谈自己的认识。发言的人很多，谈出了自己内心很多问题。下午仍然讨论。

今天我们大队又来了几位学员。

### 1970年12月20日

清早郑开放就去山头广播。我回到学习班吃了饭又和大家一起讨论，很多发言的人倾吐了几年来心里一直想说又没说的话，狠斗了自己的私心，放下了长期压在思想上的包袱。

听说县城里今天开公判会，枪决罪犯郭洁民，罪犯郭洁民贪污国家财产达一

万元，死有余辜。

### 1970年12月21日

阴沉的天终于下起雨来，我们学习班全体学员冒雨前往复兴公社听专区举行的农业学大寨广播会议，广播音量不大，杂音多，又是外方人讲话，我们没听出啥名堂。

约下午一点散会，回新阳吃饭后，我们大队全体学员下队到新阳一组参加广大贫下中农召开的讲用会。讲用会上，很多的人用自己的动人事迹讲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发言的人小的只有10岁左右，大的有60多岁的老太婆。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他们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做出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迹，我们队和他们比起来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一组的知青姜自华、杨国庆也发了言，谈了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所得到的收获。这次讲用会对我教育很大，对比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少了，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方面，学得很差，用得不够，经过这次生动的教育，我决心急起直追，今后在一切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1970年12月22日

今天仍是开展讨论，学员们继续谈自己的认识、态度，狠斗自己的私字，找自己学不好大寨的原因，全体学员统一了思想，决心今后下苦功夫，走农业学大寨的社会主义光明道路。

我今天受大家的委托写了一份《决心书》（交公社），写了一份《感谢信》（交新阳大队）。

### 1970年12月22日

今天已是学习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上午各大队学员集中在一起开会，由公社袁光富主任对这次学习班作总结，然后由各大队代表发言。我光荣地在大会上发言，我心情十分激动、高兴，最后由我代表大队宣读了《决心书》、《感谢信》（全文附后）。

午饭后学习班结束，我们背着背包回到了生产队，到队时天已快黑了。我们带着很大的信心，回到生产队决心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今天我们六个大队的学习班结束了，我们离开新阳时，其他九个大队的学习班又开始报到了。

几天不在家，地上生了很多霉，红苕也被耗子吃了很多。

### 附：《决心书》

####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农业学大寨。

#### 决心书

敬爱的公社革委：

我们水坪大队 32 名学员，以无比高兴的心情，光荣参加了公社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学习班。

在学习班里，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毛主席“五二〇”庄严声明像光芒万丈的灯塔，指引着五洲四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席卷全球的革命风暴不可阻挡地，猛烈地冲击着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日益陷入全面崩溃，离死期越来越近了。世界人民的另一大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遭到了越来越多（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人们的反对，他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的威信越来越高，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和我国建了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还十分喜悦地看到，乘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进行着伟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哲学思想，指引着人们的革命实践。在我们四川，七千万军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落实“12.25”批示和“3、5、6 号文件”的战斗中，狠批了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刘结挺张西挺的严重错误，抓紧了“一打三反”，正以尽快步伐赶上全国的形势，争取早日实现四川的万象更新。

在学习班里，我们认真地学习了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农业学大寨”的重要社论。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狠斗了过去学大寨学不好的“私”字，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出了思想中长期存在的矛盾，明确了农业学大寨的重大意义。我们认识到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农业学大寨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农业学大寨是对世界革命的重大支持，是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沉重打击，是我们对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贡献。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尽了苦难，是毛主席把我们火坑中救了出来，引导我们奔向共产主义，给我们指出了农业学大寨这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学大寨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忠，就是干革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鼓舞着我们，凭着我们对毛主席的一颗忠心，我们立下了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农业学大寨的路我们走定了，在此，我们向公社革委表示我们的钢铁般的决心：

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决心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毛主席光辉的哲学著作，用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强大思想武器，像大寨那样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农业学大寨中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农业学大寨就是搞阶级斗争，我们决心和一切阶级敌人作不留情的斗争，保证农业学大寨运动胜利地进行。

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将会碰到很多的艰难困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不管我们面前有多大的困难，不管工作有多艰苦，我们有决心克服它战胜它，直至胜利。

四，在当前，我们要把农业学大寨和“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要把“一打三反”搞彻底，要把清理阶级队伍抓紧，要狠批刘张的“黑九论”，全力促进四川万象更新。

五，“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决心把今冬利用起来，大搞小春田间管理，在年前早小麦除草施肥一次。同时大搞水利修建，一定要在今年修通金星水堰，在明年的大春中，我们还要大搞良种化，全力争取早日跨《纲要》（《纲要》即中共中央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长江流域

地区粮食亩产达到 800 斤，此即“跨纲要”，又称“跨农纲”，作者插队四年间，公社每年都发誓“今年跨农纲”，完全是空话。文革后公社解体土地下放，亩产 800 斤马上实现）。

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经大家一致讨论决定，我大队 4、5、6、7、9 队七一年跨《纲要》，1、2、3、8 队七二年跨《纲要》。

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水坪大队全体学员  
1970 年 12 月 23 日

### 附：《感谢信》

#### 最高指示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亲爱的新阳大队革委，全体贫下中农：

东风浩荡红旗飘，凯歌阵阵冲云霄。

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到您们大队参加了由公社革委举办的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在学习期间我们受到你们多方面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您们像亲人一样地对待我们，把自己的房屋让出来我们住，屋内安好了舒适的铺位，我们睡着觉得格外温暖，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阶级友爱的温暖啊！您们又让出自己的厨房供我们炊事用，厨房里锅铲碗盏样样齐备，使我们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一切的一切，证明您们实践了毛主席“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伟大教导。

值此告别之际，我们向您们表示兄弟般的最诚挚的感谢。

在学习期间，我们亲眼看见了您们农业学大寨高潮中忘我劳动的一个又一个动人场面，您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战斗中做出的惊天动地的事迹，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向您们学习，向您们致敬！并祝您们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就要奔赴农业学大寨的前线，我们一定把您们的先进经验带回去，以促进推动我们大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坚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再一次表示我们的谢意！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水坪大队全体学员  
1970 年 12 月 23 日

1971 年 11 月 10 日

……（前面内容略云：今天从水坪到复兴赶场，然后到东溪区，又从东溪区

到乌杨公社去看望六妹，共徒步 80 多里山路。六妹陈瑜，1971 年初中毕业后插队忠县乌杨公社将军大队，这是作者第一次去看望六妹。)

翻过最后一道山岭，晚霞下的乌杨出现在我眼前，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啊，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不然后果多难堪啊。

我们从山顶下到山脚，找到了六妹所在的院子，这是一个挺大的院子，人们都已经点灯了。我心情激动地叫开了六妹的门，六妹见到我高兴万分，她老早老早就希望我能到她那里，这次我意外地到来，使她又惊又喜。六妹一副劳动后的模样，补疤衣服上沾着泥巴，脚也像才从泥地里拔出的一般。可以看出六妹的生活是艰苦的，听她讲，每天早上她比社员先起床一小时发煤球火，而社员也在天亮前两个多小时就起床，可想六妹是起得多么早，六妹向我讲了很多她的劳动、生活，使我对六妹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她年纪比我小，可生活劳动比我还艰苦。

### 1971 年 11 月 11 日

睡意朦胧中，听得院子内响起阵阵哨子声，紧接着有人大声喊叫：“起来煮饭，现在三点半了！”三点半了，难道三点半就要起床吗？果然，哨子声停止后，院子里开始有人烧火了，有的地方传来切萝卜红苕的声音。我猛然想起昨晚六妹不是说她比社员们还早起床一个小时吗？那不就是两点半钟了吗？啊，我不由得心里缩了一下……六妹苦啊！

我起床发起了煤球火，几乎是和社员们同时起床的，但天亮后很久才煮熟了饭，要是出工就晚了，怪不得六妹要比社员先起床。正好今天大队召开社员大会，会场就在六妹的院子，会议内容却是，宣布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叛党叛国分子林彪的罪行。

我提议到场上去要，因今天乌杨正逢赶场，我从没有赶过乌杨，很想去看看。谁知到了场上竟空无一人，往日繁华的集市连一点繁华的影子也没有，任何店铺都紧闭着，就像晚上一样。我们很不明白，后来看见了一张告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接上级指示，11、12 两日全公社各大队一律召开社员大会，场上各单位也如此，两天内一律停止营业，关门开会。回到将军大队，大会还在继续开着，社员们已被激发得非常愤慨。

### 1971 年 11 月 12 日

今天六妹仍开会，不过今天不是社员大会了，而是干部和知青们开会，内容是讨论昨天的文件。县里来了一个同志在六妹们的院子里蹲点，组织社员们讨论林彪罪行，队里每天晚上都要开会。

---

#### 【昨日心迹】

## 一个“右派”女儿的知青日记

孙丹年

按：孙丹年，女，父母均为“右派”，父亲孙铭勋是陶行知的弟子，重庆育才学校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执政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被批判，育才学校被扼杀，孙铭勋在“三反”中被以莫须有罪名打成“老虎”，“反右”中又被打成“右派”，大饥荒中饿死，且住房立即被单位收回。其妻邝忠龄因不愿与丈夫“划

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最后“改正”时却查不到划右派的决定），为了解决没房住的燃眉之急，也为了两个女儿的前途，被迫嫁给当地（重庆市北碚区）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村生产队副队长，1969年1月31日，孙丹年正式将户口从学校办到继父所在的红光公社红光大队红光生产队（之前和之后它都叫金刚公社金刚大队金刚生产队），正式成为下乡知识青年。三年后妹妹孙丹平也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孙丹年的外婆因成份为“地主分子”，文革中被迫从湖北舅舅（地质队干部、共产党员）家迁来。

文中括号里的楷体字是为便于读者理解而加的注。

**1969年9月18日 星期四 晴**（将满18岁，当知青8个月了）

这几天的太阳越来越大了。眼看就要过中秋节，国庆也不远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的通知，要大家做大扫除，热烈庆祝二十周年大庆。今年的国庆一定是十分热闹的。

今天上午大扫除。农村的院落是没有多大扫头的，只是把草铲了，把沟沟掏了，渣滓堆清理好。虽是这样，我们划分的这一段共三个院子，一上午只搞了两个院子，都没搞完。剩下一个竹林角还是下午才去的。

下午我们收灰（柴草灰，栽种胡豆时做肥料用），收来以后准备点（“点”，即撒种）胡豆。昨天晚上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得很清楚：“寒露霜降，胡豆麦子上坡。”现在已经快要到白露了，大概还有半个月就要点麦子胡豆，必须要把肥料准备足。还要抓紧时间种蔬菜，像白菜等。胡萝卜和水萝卜也要加强管理，时间是不多的。同时还要搞政治活动。

晚上接到通知，要我们知识青年明天下午两点钟在北碚人民会堂听报告。刚才打了钟，要开社员大会，我一会儿就要参加社员大会去。

**1969年9月22日 晴 星期一**

昨天晚上王队长把照电灯的二十三家人找来开了会。前天晚上来检查了电灯，我们生产队电灯的情况实在糟。最先，照十五瓦灯泡的每月三角多钱，后来五六角、七八角，终于发展到一元多一个月了，实在太贵。主要是很多人照通夜，一夜就要照三夜的电。最近一年多买不到灯泡（当时电灯泡凭票供应，有时拿着票也买不到），灯泡坏了就只有不照，或者是去找大灯泡来照，六十瓦和四十瓦的。二十五瓦的占大多数。也是整夜不关。那怎么会不贵呢？昨晚上就订了制度，总闸刀晚上十点关，早晨五点开（即深夜里禁止用电）。你想照通夜也没有办法。另外找了两个人专门负责这事，半个月检查一次灯泡。平时什么时候想查就查，照了大灯泡的照大灯泡算钱。这样一来就好，再也不用每年花十多元钱照电灯了。

**1969年12月31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1969年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年是我的历史上一个大变化的头一年。今年1月份，我把户口从学校办回农村，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

27日的下午，我们关了饷（关饷，川语，即发工资，这是1969年全年工分决算），共是209元，今天拿70%，146元。（我家有继父、外婆和我三个农村户口。继父和我分别为男、女全劳力，外婆是“地主分子”，61岁了，强迫劳动，工分非常低，也能挣一点。另外我母亲、妹妹、弟弟都是城镇户口）。

这几天我们为了买灯心绒，到北碚、三花石、团山堡，几天都在跑路，都没



有买到。明天就是元旦了，明天到团山堡和北碚去，看有没有……（因灯心绒布结实耐穿，在贵州的大舅家庭人口众多，他听说重庆有灯心绒卖，要我们为他买几丈布票的灯心绒。我们家自己也想买。但是当时即使有足够的布票也很难买到。）

### 1970 年元旦 雨 星期四

跑了一天的冤枉路。上午先到团山堡，没有灯心绒。然后到北碚，北碚上边和下边的百货商店都没有，于是我们马上坐车到了三花石，也没有。我们到北泉吃饭、洗澡，回家。然后又到团山堡，还是没有。我又回家拿来糖票、线票（线，即缝补衣服用的棉线，当时也是凭票供应），又到团山堡，买了糖和线。回家后再到金刚碑买白菜。这一天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还要努力多做工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也是为了自己而多劳动。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劳累，以免影响身体，得一身病。去年就是因为太过分，身体吃不消，得过几次病……

### 1970 年 1 月 3 日 晴 星期六

晚上分肉。十八梯左海全的猪死了，每人分一两肉。我们去候了一阵轮子，三角钱拿了三两肉。回来一会儿就吃了。

### 1970 年 1 月 4 日 雨 星期日

（到八塘去赶场，为了买小猪和买年货）早上 4 点多钟就起来了，把饭热来吃了，一切东西都准备好，4 点 40 分就走。天还不亮，一点看不见，幸好走的是马路。快到北泉了，看见一些人担着菜、鱼，提着马灯，他们说是从八塘下来的（他们是挑到北碚去卖）。后来公路走完，上了小路，因为看不见，我和严光才直踩到水。汗水都走出来了。到了双石鼓，天已经蒙蒙亮，基本上能看得见了。这时已走了一半多点，剩下还有 20 里左右。

到了八塘先到猪市（小猪崽市场）。猪贵得很，和澄江、北碚等地差不多。然后到正街去，街上空得很，人还不多。从场口走到一座小桥桥上，很多人，买卖黑市肉就在这里（“黑市”的肉不用肉票，价格要贵些）。肥肉有三、四指膘的，要 1 块 9 角到 2 块钱一斤，差点的 1 块 8 角。继父买到一块猪肝，1 元 2 角一斤，上边还有一点猪油（猪油当时是稀罕物品，可以用这点猪油来炒这块猪肝），共二斤多一点。然后看见一个卖水糖的，喊 1 块 3 一斤，讲了价，1 块 2，称了两斤。花生也贵，要 1 块 5。核桃要 1 块 1、2 角。我看见一个老头卖核桃，喊价 1 块，继父去讲了一阵，讲成 8 角，称了两斤一两。继父又称了三斤甘蔗。

人越来越多，在街上挤了一阵，几个人走散了。剩下三个人。雨也下大了，找个馆子吃了饭，回家了。一身淋得水流，走得很快，到了澄江口坐车，到北泉下车，再走回家。

晚饭把猪肝炒了，刚够下饭。继父说等快过年时，还要再去一次八塘。

### 1970 年 1 月 6 日 阴 星期二

天晴了，但还是阴沉沉的，雪点子依然在飘。上午上班休息时，我回家去把羊子牵出来吃草。羊昨天在家里关了一天，饿得不得了。

中午饭后我再把羊子牵出来，并背了个背篋打猪草。下午下班时，打了半背篋猪草，羊也吃饱了。并且还拣了一把柴。

### **1970年2月7日 晴 星期三**

早上到处都是白头霜，冷得很。上午开社员大会，王队长讲了今年的出勤制度，农忙季节必须严格遵守出勤制度，农闲时间不管你的。再一个，开会不写工分，只能抵政治出勤。每星期开会一次，每年48天，这48天中，如果你有10次没到，那么就照比例扣你这10次的基本口粮。有特殊情况必须请假。干部开会，酌情写工分。

王队长又说到某妇女，说她因为超支，想依靠爱人的单位（煤矿工人）补助自己，这是不行的。本来嘛，她好吃懒做，养得肥肥胖胖，人口又多（生了四个孩子，平时超支严重），现在倒差生产队的钱，又想生产队出证明，证明她有产假、病假，好到工厂去要补助。这怎么行呢！

下午这个妇女为了开证明的事情，和支书的爱人吵架。晚上，王队长到这个妇女家去，清理她吵架的问题。他们一起到了开社员大会的地方（说理给大家听），这个妇女哭起来了。对这种人，只有加强教育，使她们改正好吃懒做的毛病。但我相信她是不会改的。

### **1970年1月14日 晴 星期三**

中午吃了饭，我到崖边去割了一背刺（柴草）……割刺的本领是几年前从继父那儿学来的。那时他没有害病，生活也比较的好，我们割了很多的刺，都是继父抽下班、休息时和我们一起割的。晒干后斩成节节，堆了半间屋。现在好久没有割刺了，煤炭不容易担（要凭煤炭票，还要花钱，6角钱一百斤），必须多拣柴。

### **1970年1月18日 晴 星期日**

早上秦□□（中年农妇）来找妈妈替她写信。妈妈已经走了，她想了一阵就叫我给她们写，要以她女儿的语气，写给女儿的男朋友，说她女儿到亲戚家去了，希望男朋友过春节不要来。这是一个骗局（当母亲的暗中阻止女儿和男朋友来往），但我还是替她写了。

### **1970年1月19日 晴 星期一**

昨天猪病了，浑身直发抖，又不吃猪潲，妈妈赶快拿药和陈艾叶子烧灰给它吃。又拿药草和酒给它擦背。好像好些了。但今早上又不对了，于是中午就去请猪医生来给它打了一针。晚上就好了，它吃得很饱去睡了。

### **1970年1月22日 阴雨 星期四**

猪又病了。本来猪医生给它打了两针已经好了一点，谁知昨晚上寒潮来了它又冷病了。上午我和妈妈，还请一个邻居帮忙，用菜油、鸡蛋调好了喂它。它不吃，就灌。晚上又请猪医生来打针。

### **1970年1月23日 阴雨 星期五**

妈妈告诉我，有的人一心只想吃好、穿好，一心追求名、利、工分……相反有的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向他们投来的却是赞美的眼光。我要做后一种人。

### 1970年1月24日 晴 星期六

早上王队长喊担瓦炭（为砖瓦窑担的煤炭），我起床就去了，头没梳脸没洗，更不要说吃早饭了。

到了缙云山上的腰店子，先去的都在那里等着，因为煤厂管理员汪素卫不开门。天气很冷，我饿得不行，但是没有办法。好不容易担到了煤，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担到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妈妈来接我，帮我担了三、四十斤，还替我把饭放在瓦厂热着。于是我又去担第二趟。真是害死人，脚不知道怎么痛起来了，是脚掌那儿骨头痛，走路都是跛的。终于挪到黄葛树（一半路程了），继父去担第三次煤没有担着（煤炭没有了），他转来就和我分担我那一挑，这才担回来。

### 1970年1月25日 晴 星期日

早上我去北碚看脚。中医院号满了，我到殷医生那里看的。他给我一些药钎子，叫我烧脚掌。烧了几次，脚就不怎么痛了。证明殷医生的医术是比较好的。

### 1970年1月27日 晴 星期二

早上没吃饭就去担瓦炭，到打石湾第三厂（比腰店子远一倍）。去的时候跑得汗水直流，我只担了80斤（因为脚痛），回来遇见妈妈也去担煤炭（妈妈作为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被迫从事惩罚性劳动），我就捧了10斤给她，继父和妹妹又一人捧点给她。我的脚又痛起来了，走路都一拐一拐，幸好担得轻，好不容易才担回来。下午又去担了一次，只担了70斤，走过腰店子时，简直不想走了，幸好到活拉子时，妹妹来接我们了。

晚饭我吃了一点点酒，准备洗脚时再用酒搓一下脚。明天如果脚好了，再去担一次瓦炭。因为这个月工分做得太少了（第二天下午担粪，共担了八次）。

### 1970年2月2日 阴雨 星期一

大概是从“四清”开始，我不相信书上说的那一套好听的共产主义理论了。

我发现运动中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这种发现开始时是模糊的，怀着猜测心的，后来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感到说不出的痛苦和难过。甚至有时我感到这一辈子是不能出头了。思想上的压力，使我在学校中越来越脱离群众，从本来的政治地位上跌落下来，变成别人所瞧不起的、受排挤打击的人。

中午吃年饭。两大碗肉：一碗扣肉，一碗鲜肉（粉蒸肉）。还有两碗豆豉和蒜苗炒腊肉，还有两碗炒莴笋和半锅萝卜汤。一共大约有十斤肉，我们每一样吃了些，大概去掉了三斤肉。剩下的放到三天后除夕再吃。

### 1970年2月6日 春节 阴雨

（1969年全年决算后，1970年元旦生产队给社员兑现了70%现金，春节前又将余下的30%现金发给社员。我家关饷63元，春节去买衣服。）

供销社在卖华达呢，和不要布票的布。我嫌贵，没有买。又看见在卖卡其布衣服，女式二号，我去拿来一穿，正合适。只是颜色不好看，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但是可以比灯草绒衣服少四、五元钱。这四、五元钱再加上十元，就可以去称一斤毛线。于是就买了这件衣服，花了五元四角一分钱，五尺五寸布票。又去买了一斤深红色毛线，十五元零五分，五张工业票。（这件颜色难看的衣服，由于结实耐磨穿了很多年。后来在肩膀上打了两个补丁，再后来前胸和后背都破成了一缕一缕的，就剪开了，好的部分变成了别的衣服上的补丁，坏的部分纳了

鞋底。一斤深红色毛线织成的毛衣，一直穿到 1978 年考取大学，才拆成线团。）

### 1970 年 2 月 7 日 晴 星期六

听说一件事情，说是重庆市教育局把日期计算错了，昨天不是初一，今天才是正月初一。

管他呢，汤圆吃过了，肉吃过了，难道不是一样吗？

### 1970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五

上午担粪。看见生产队的一个提了干部的知青，和其他干部一路走，有的社员就说：“妈的，这些干部一天到晚不上班，光是开会听报告，我们做出粮食、钱，来供养他们，太不合理了。”我想这些话也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干部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他必须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那是不行的。但是在我所遇见的干部中，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密切地联系群众，他们都对群众吹毛求疵，只知道联系上级。像农村中的干部，脱离劳动、半脱离劳动的比较多。像那个知青，他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爬上了领导贫下中农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完全脱产了。在社员们看来是很不好的。

另一方面，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

### 1970 年 2 月 15 日 晴 星期日

昨晚上生产队开会，我因为肚子痛没有去。睡了一觉，忽听得狗咬，又听见有个熟人大声说话，马上人声嘈杂，把我吓醒了。这时已是 11 点多钟了。

今天上班，记分员问我昨晚上为什么没有去开会？另一个人就说，继父替我请了假的。记分员问：“假条呢？”我说如果我能够走到王队长那儿请假，不如干脆开会算了。记分员不相信，他说年终结算时，不开会的人也要扣粮。

我想，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 1970 年 3 月 2 日 晴 星期一

羊子长了一截，这几天它都吃得饱饱的，胀得不能再胀了。兔子也下了小兔，母兔让小兔呆在窝里，我们连看都没有看见，更不知道是几个。鹅儿也长大了些，快要换毛了。因为今年猪价高，本来打算去买一只猪，喂到过年时杀，也没有买。所以妈妈就喂这么些家畜，以备将来肉食不足时杀。

### 1970 年 3 月 5 日 阴 星期四

生产队叫每户社员投资大粪（当时种庄稼施肥都是用大粪，大粪是有质量区别的）。

今天担了好几家的粪，要分别定级。朱胡子家的粪太孬了，打了八折。当讨论另外两家的粪是否打折时，没人开腔。后来有个人说不应该打折。记分员说，如果有个粪表就好了，把粪表往粪里一插，该打几折就打几折，又省事，又不得罪人。

我想，这个粪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 1970 年 3 月 7 日 阴 星期五

上午有干部到公社去听录音大会，是重庆大田湾广场开公审大会的录音，公审了 21 个现行犯罪分子，全部判死刑，立即执行。下午这个干部和社员谈起很

来劲。

上午上班时把羊子拉到荒芜的田里去吃草，（羊子挣脱了绳子）它吃了麦子（麦苗）。有个年轻女孩和我比较好，她说她帮我把羊子拉过来拴好了，还说管副业的副队长的老婆直是吵，说我的羊子吃了很多麦子。另有一个妇女也义愤填膺的控诉羊儿。于是我拉起羊儿走到十八梯开大会的地方，查看不过吃了三、四十窝麦子（由于是麦苗不是麦穗，它还能长出来，没有追究，不了了之）。

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家里喂了羊，没有人照管，弟弟又不争气。我每天把羊子拉到外面去放，它力气大，经常扯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并不是哪个故意要这样。羊子喂着实在恼火，拴在有庄稼的地方，它扯脱了就要吃麦子，拴远了又不放心（怕被过路人“顺手牵羊”偷走）。我打算喂它熟猪草吃，不知它爱吃不爱吃？明天试一下（第二天将熟猪草放了些盐，但它还是不爱吃）。

晚上到邻居家把公兔拉来，准备再给母兔配一次，让它再生一抱小兔。

### 1970年3月14日 晴 星期六

下午四点多钟开始评工分。我想评分时我最好是走开。免得对我的工分有意见的不敢提（已经有过一次，和我最好的女知青比我少评半分，她意见大得不得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友谊。我想，对我的公平多半来自社员们对我继父的敬畏）。于是我就回家放羊去了。没想到刚回家，继父便怒发冲冠，他叫我立刻去开会，而他自己在家里煮饭喂猪。我手中正拿着《七侠五义》，要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对书最感兴趣，看得上瘾，因此我不想动。于是继父冒了火，拿起扁担向我扑来，把我吓得赶快从灶房走到卧房，打算先把书放好。他又赶来大骂：“我把书给你烧了！快去开会！”于是我又走到外面来，委屈得不行，坚决不去开会。等继父走了，我到屋里取出书来，到后面的竹林里坐了一会。妈妈回来了，说了我几句，我才去开会了。刚好这时评到我，得到妇女最高分7.5分。而上次不服气的女知青仍然比我少半分。可见群众是有眼睛的。他们看见我哭过，都很惊奇。我发觉他们总是看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给我评最高分是因为我经常担粪）。

### 1970年3月18日 晴 星期三

谁知今天下班时忘了拉羊子，后来想起到坡上去，它已经挣断了索索，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幸好没有吃几根麦子。五娃儿跟我说他看见羊在上面，严三妹又说在另外的地方。继父在坡下自留地，听见我的声音就乱骂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老人说我的羊已经跑回家去了。我回家走到菜园土，继父不分青红皂白，给我一顿狗血淋头。我也不怕他，他说一句我顶一句，他便要打我。我今天倒要看看怎么个打法呢。结果妈妈出来了，他也没敢打。

### 1970年3月19日 晴 星期四

明天星期五，金刚碑小学又要妈妈去为食堂担煤炭（妈妈是“右派分子”，管制对象，经常被罚作无偿劳动，和另一个被管制分子一起，承担了学校食堂的全部劳役，往往是我和妹妹代替她去担菜担米担煤）。妈妈的肿病又发了，肿得很，一天还要不停的劳动，受人指使。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定要让妈妈好好享点儿福。

### 1970年3月20日 晴 星期五

继父总是说我头脑不灵活，夸奖那个比我少评半分的女知青灵机转变很快。

他也没考虑过，如果我像那样的话，恐怕早就被他打出门去了。就目前状况（这样的老实），还经常猪不是、狗不是的挨吵挨骂。

### 1970年3月28日 晴 星期六

中午，生产队买猪的车回来了，前天去的，到隆昌去买的。十多头猪，最大的21斤，最小的6斤。叫愿意买猪的人去抓阄。有些人没有抓着，我们抓到第二号，是一头“过槽猪”（即不是幼崽，已经被转卖喂养过的）。15.2斤，虽然没有别的猪好看，但条势还可以（身材好，能长得高大。几天以后生产队又到隆昌去买了几十头小猪，我家又拉了一头12斤的）。

别人还帮我家买了20斤红苕，随车带回来。

### 1970年3月29日 阴 星期日

生产队叫社员去称包谷（返销粮），许多人都叫唤没有吃的了。有的人早就没有吃的了，东挪西借（我一个姓冯的小同学，结婚后和妻子天天吃牛皮菜当顿，脸都浮肿了）。今天叫称包谷，全都很踊跃。每人7斤，我家21斤。我们家一共还有117斤包谷，刚能接上小春。“麦出刁，四十朝”（“刁”系川语，指麦穗），要五月底才能分到小春。不过嫩胡豆出来了可以当饭吃。

### 1970年4月3日 晴 星期五

担粪到白连湾的路又陡又窄，有一次我（担着空桶）没有让刘远银，被他说了几句：“是重载让空船，还是空船让重载？”（受到一次中国农村的传统道德教育，例如打空手者礼让负重者、年轻人礼让年长者，等等）。张玉发跟在后面也来数落我：“担煤炭时她也是这样，她担个空箩筐，老远就朝你搡过来。”我想自己以后要注意这些问题。

### 1970年4月4日 晴 星期六

中午发现小兔不知被什么东西咬死了一只。我把它的皮剥了，炒了一碗。

### 1970年4月9日 晴 星期四

上午点豆子。中午提前一小时下班，去担瓦炭。

我们一家三个人共担了700多斤煤炭，妹妹担了三次300斤，我和继父各担了两次共400多斤。没吃饭就去的，担第二次时又饿又累，简直不能走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是这样。咬着牙才担下来。回家刚刚打下午上班的钟，胡乱吃两口饭，赶紧去上班。妹妹下午不上课，她慢慢走，多担了一次（妹妹还在上中学，不上课时也帮着做工分）。

### 1970年4月11日 晴阴 星期六

陆游的咏梅词，就是毛主席引用的那首，使我很感兴趣，越读越有韵味。因为我发觉我的思想就有点如此。不过没有学问，说不出来，不能像陆游那样借题发挥。

虽然现在学那些古体诗词也没有用，我还是想试写几首，但找不到老师。如果在大众面前这样（酸溜溜，文诌诌的），会被人耻笑，甚至受打击。我只想悄悄学学。

### 1970年4月12日 晴 星期日

看见别人打畜生，心里总是大不安逸，特别是看见别人打我经常喂养的东西，心里就痛它。今晚上继父打羊子，因为羊子吃饱喝足，在那里乱跳，他就使劲打它，我心痛得差点哭出来。还有那次继父打猪，也是向死里打，我去拦，还把我的脚打了一棍。似这种畜生的冤枉，比起人们有时的情况来，也相差不远，它们不会说话罢了（文革开始以前，继父对我和妹妹是比较慈爱的，文革开始后他感受到极大政治压力，被排除在贫下中农协会之外，话语权丧失，非常失落。尤其是“地主分子”外婆从湖北来了以后，情况更加复杂，他的心情经常都很糟糕，脾气暴躁，动辄大发雷霆，随时破口大骂，使全家生活在恐怖中，如同地狱。一次他用锄头柄将妹妹的腰打伤了，治疗、将养很久才痊愈。1974年冬发现他患胃癌已至晚期，曾经送入缙云山上的空军疗养院。1975年春天去世。这个过程中，家庭经济陷入极端贫困，也曾连续多日以牛皮菜和萝卜为主食）。

### 1970年4月14日 晴 星期二

我这个人最笨了。不会动脑筋。上午在大沱口开荒，我挖了些柴，下班时王少云主动帮我扛锄头。下午仍然在那里点包谷，收早活路，王少云挖了一个青桐树疙箐（即树根），扛在肩上，另一只手提着锄头。他没有叫我帮他扛锄头，我也没想到。后来他把锄头交给刘远银帮他拿，我后悔莫及，心想别人上午看你不好拿柴，主动帮你扛锄头，下午别人不好拿锄头，从你身边走过几次，你都没有想到要去帮他拿一下。以后做事要看情况，不要闷着头，免得对不起别人。

### 1970年5月3日 晴 星期日

王队长气势汹汹找我，说我弟弟（7岁）摘了苹果。又叫我去问一个妇女，她的儿子口袋里还有没有苹果。我只好来问。弟弟说他摘了3个，说另外那个小孩摘了5个。我就去向王队长汇报。每个苹果扣5角钱，星期三才宣布的。但是继父不依，他说又没有在弟弟身上找到苹果，只是在地上发现，就能归到弟弟身上吗！（估计最后不了了之。我被利用了，王队长既不敢找我继父，又不敢找那个妇女。我太傻，其实我应该推到继父身上，而不是傻乎乎去盘问和汇报。不过这种傻劲使得社员们对我产生信任，后来选我当记分员和出纳。）

### 1970年5月5日 晴 星期二

身上不知道长了些什么东西，又痒又痛，像针扎一样，两三个晚上挠得睡不着，睡着了也乱做梦，噩梦。白天上班没有精神，家务事还像追命一样。

### 1970年5月6日 晴 星期三

昨天洗了澡，穿上干净衣服，过一会儿就觉得大腿像针扎似的痒，后来越痒越厉害。妈妈叫我明天早上到金刚碑街上的吴医生那里去看病。昨晚上一整夜翻来覆去，这里抓那里挠，一夜没有睡安稳，今早上眼睛都肿了。

早上早早就到吴医生门前等着，等了好半天他终于起床了。他说这是出风丹，抓了些药（花了好几角钱）。然后就上班，担粪淋包谷。休息时我发现腿上有些虫在爬（芝麻粒大小，乳白色），当时就打死了6个。中午回家脱了衣服一看，天哪，全身起码有三、四十个老鼠跳蚤。我想一定是柜子里的，就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全都用“223”药水泡了，拿到河沟去清洗，这才又去上班。晚上又洗澡换衣服（之后连续好几晚依然不能睡觉，用高锰酸钾泡水洗，用大蒜擦，都无用。

其实那不是老鼠跳蚤，是麦秸腐烂之后生的虫，前后四、五天，可能已经在我身上繁殖了好几代。)

#### 1970年5月10日 晴 星期日

红岩生产队的知青雷建芬(她是个大龄知青，结了婚的，好像还有孩子，不知是什么关系到这里来的)住的草房又破又烂。我想公社那几爷子真太不要脸了，把知青的安家费把握着不发下来，眼看有些人困难得很，也不解决，正像毛主席说的：麻木不仁。

#### 1970年5月12日 阴 星期二

在对面坡上挖一天荒土。下午我跟几个女青年和小媳妇讲《七侠五义》中颜生的那一段，真令人眉飞色舞，听读共感。我也不怕她们日后提意见，以后我也不再讲了。但大概她们也不会那么做(去领导那里告发我)。

#### 1970年5月13日 雨 星期三

今天我们家送猪(即把养大了的猪送到肉食公司去，标准为130斤)，本来猪又小又瘦，可能没有达到标准，但是没有东西喂它，没办法，只好送了。继父害怕不够标准，食品公司不收，还得抬回来(再掉了膘，离标准更远，将会多养很长时间，更不划算)，他叫我到大队和公社去打条子盖章，说明有特殊情况必须送到食品公司，这是打个万一没有办法时的主意。

我到大队盖了章，又到公社。公社没有人，我很着急，赶快到北碚何家嘴去看情况到底怎么样。到了公司一看，大大小小几十头猪挤在那里。有一头差三斤才够标准，过秤的人说算了，差两三斤问题不大。后来轮到我們，差两斤，也没有打麻烦，就算交脱了。得了25斤包谷，1尺布票，3斤粮票，38斤肉票，56块钱。

我和妈妈去扯了一丈花布来缝衬衫，又给我买了一双全胶的胶鞋。

#### 1970年5月14日 雨-晴 星期四

今天公布了五个月来的工分，准备不久分小春粮食时，同时就分工分粮。我做了1112分，其中包括妹妹做的80—90分。继父做了1238分，外婆做了300多分。全体女社员中只有我和另一个中年妇女上了一千分的。

#### 1970年5月16日 晴 星期六

今天真是繁忙紧张的一天，早上五点半到中午十二点，收胡豆，面积很宽。下午从两点到夜里八点，在坝子里打胡豆、挾麦子(脱粒)。王队长说天气预报半夜有雨，必须把胡豆全部打完。一天劳动了12个小时还多。

#### 1970年5月18日 晴 星期一

妹妹因为平时劳动量过大，这几天病得厉害，家里又没人做事了。

外婆呢，也在生病(外婆高血压很严重)，头痛，吃不下饭。又怕不去上班以后要扣口粮、扣出勤。但是又不敢写假条去批。

#### 1970年5月21日 晴 星期日

早上割麦子，手指头被割开一条口子。吃过早饭，我想应该去担麦捆子，谁



知组长不许我去担，我就在坡上抱麦子，好让强劳力来捆。

今天是妈妈生日（满 40 岁），吃肉。

下午到大沱口割麦子，我的裤子是旧的，有几个小洞，虽然打了四个补丁，但补丁也快要破了，屁股上的还没来得及补。经过一蹲一蹲的，屁股上就破了一个大口子。没办法，我找一个妇女借了针线，马马虎虎缝了一下，管它好看不好看。

晚上是最忙的，七点半才下班，每人背一捆麦子回来。组长连吵带骂，说我们麦子没有放好，于是又加班堆麦子。然后每人分 15 斤豆梗柴，我赶快去捆好了，排队过秤有 50 斤（我家三口人应该为 45 斤，占了点便宜）。最后想起金刚碑街上还有妈妈下午称好的 100 斤煤炭（这是凭煤炭票供应城镇人口的），我又赶紧去担。因为全部是上坡，担了一半路继父来接我，不然不知道怎么办才担得回来。累得晚饭都不想吃。

妈妈病了，全是累的、晒的。我叫她多休息几天，她不干。

### 1970 年 5 月 25 日 晴 星期一

妈妈生病，请了三天假，这几天都去疗养院打针。

我每天早上拉肚子，接连四个上午都没有上班。下午我去上班打胡豆（用连盖脱粒），刚打了一会儿，组长叫我们到杨家湾（在缙云山的半山上）去担麦捆子。我只担了两次，因为力气不够了。

（因为生病在家）这几天我看书的成绩倒不错。三部《塔上旗》（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都看完了。我向往着这种有秩序的、严格的、但是相亲相爱的生活。如果我能够在这种教养院里度过我的少年时代，该是多好啊。我羡慕着书中的人物，那些孩子们都是有脑筋、能独立思考问题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很特别的，合情合理的。那些大孩子都是特别的人才。在中国，在我的周围，这种性格习惯的孩子基本上没有。

### 1970 年 5 月 30 日 雨 星期六

生产队有三个青年去修铁路，大概在广安一带，每月吃 45 斤粮，32 元钱（其中 15 元交伙食费，11 元交生产队，6 元津贴）。

过端午节要关饷，每一千分关 20 元。每人有三两肉票，2 寸布票。

### 1970 年 6 月 1 日 阴 星期一

二零六坡顶上，已经埋了十多个铁道兵部队牺牲的解放军。那么多的坟，有一个是四川大邑的，姓程，去年 3 月参军，9 月就牺牲了。可见得修一条铁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 1970 年 6 月 3 日 晴 星期三

栽了一整天红苕，不知为什么累得很。没精打采的，懒洋洋的。

中午回家，兔子跑了一个到坡上去，在自留地里来回钻（我家自留地和别人的连在一起，它也在别人的地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把它赶回来。回来后捉住它就往地下一摔，马上就死了。于是把它去了毛破了膛，晚上烧着吃了。这是我们吃的第二只兔。还有 5 只小兔，而且洞里还有几只奶兔。

### 1970 年 6 月 4 日 阴 星期四

下午有两个人担了些杏儿到十八梯来卖，一角多钱一斤，张□□称了点，酸溜溜的。曹大珍怀着孕，想吃杏，没有钱。她厚着脸皮去找张□□要，张□□被缠不过给了她一个。她吃了又去找张□□要，张□□死活不给了。我想一个人没有钱确实不好，受这样的“方”（川语，羞辱之意）。张□□也真是的，就拿一两个给她，有什么呢。

晚上我去找王□□，想找她还上次借的1元钱，她借的时候说好了关饷就还。这次她关饷很少，只有1元7角，又被她二爸拿去了。要下次才能还我们。王□□真没志气。（后来她被调去修铁路，她离开之前我赶紧去找她还我1元钱。之后，要账的来了不少，有的要求还2元钱，有的是1斤粮票，有的是1尺布票。把她的二爸王队长气得够呛，王队长代她还了1斤粮票，其他的都拒绝还，白跑路。还听说王□□偷她妈妈的布去卖，被打了一顿。此后我再没有见着她。听说后来她当了老师）

### 1970年6月6日 雨-晴 星期六

搞了一天便宜工分。上午刚刚挖了一会儿土，组长叫我到瓦厂给担砖坯装窑的记工分。我就坐在那儿，来一个人我写一笔。叶光理不识数，他担26匹一回，我问他担多少，他说21匹。后来他兄弟说是26匹。

看见那些男劳力担着砖坯，一个个压得弯腰驼背，我想下力人真苦啊。

下午从窑顶往下递砖坯。组长派的几个递砖的人真不顶事，懒伸懒干的，斯斯文文的。尽管窑田四周砖坯堆起很高，她们还是递几块伸一下腰。其中有一个最不成话，空话又多，不停地叽叽呱呱。后来我和照看窑子的吴大爷也去递砖。

晚上趟了一双袜底。

### 1970年6月7日 雨阴 星期日

明天端午节，很多人都在包粽子。可是我们没有留糯米，吃不成粽子。

往年端午节多热闹啊，划龙船的，卖糯米粽子的，上街玩要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可是这几年呢，破四旧都破了，龙船也不划了。只是农民依照旧风俗要吃粽子、不上班。

### 1970年6月10日 晴 星期三

听说徐树云死了。我想他死了倒比活着好，不死才是活受罪。七、八个儿女没有一个照顾他，为了买些鸡蛋给他吃，一家人还吵得个不亦乐乎。焉知人们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老来受罪吗？

一会儿坡上就“哭”开了。一个老大爷也“哭”，另一个老婆婆也“哭”，一个中年妇女也“哭”（“哭”是一种唱，相当于“长声咏叹调”。死者与后面这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于是几个青年妇女被逗得大笑，我也觉得真笑死人。

### 1970年6月12日 晴 星期五

担粪淋包谷。我的裤子上全是粪，粪干了起壳壳，就像从布壳上撕下来的一样。天气热得很，汗水一串一串地掉。

### 1970年6月13日 晴 星期六

因为妈妈走时没有把门关好，兔子跑了两个到坡上去。当时我们正在对面坡上休息，看着干着急。外婆赶紧回家来赶兔，只赶回来了一个，还有一只硬是不

回来。中午下班，我跑了一面坡都没有找到它，真以为丢定了。下午下了班全家人一齐出动，继父把它的后腿打跛了才捉回来。真是害死人。妈妈叫我明天把它背到街上去卖了。

### 1970年6月14日 晴 星期日

我穿上新衣服新裤子，背上兔子去赶场。到了北碚街上，我去问了别人卖兔的“行市”，一眼看见张显伯（他年龄十四、五岁，相当于初中生，上小学时成绩差得招人嘲笑，早已不上学了）坐在那里卖兔，他有两只大的，三只小的，三只小兔是六妹托他卖的。

我把兔放在他那里，坐在旁边看他怎样卖兔。张显伯卖东西很机灵，脑筋很活动，他家买卖东西都是他。

一会儿他就以6毛5角一斤的价格卖了一只。后来又以6毛一斤的价格把我的和他的另一只兔卖了，我那只兔3斤3两，1元9角8分钱。我没有想到应该叫买方给我一个整数，即要求他给我2元。张显伯一阵小九九算账，把买方弄得云里雾里，最后他还说“四舍五入该我得”，又多挣了1分钱。

（事后我想了一下，他凭绕来绕去算账，多挣了大概5分钱以上。而我如果也像他那么算的话，至少可以多得2分钱。而且我的兔子应该不止6角一斤，起码也应该在6角2、3，想起来挺不划算。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做买卖”。）

只剩下六妹的几只小兔脱不了手。六妹来了，还是叫张显伯帮她卖，我和六妹一起到街上买东西。我买了一双锦纶底的袜子，又买了一个塑料袋子。六妹买了罗纹纱布回去缝蚊帐，又买了一顶草帽。

我们回去看张显伯，他正在和买主讲价钱，六妹一去就简单了，以每只三角钱的价把小兔卖了。

### 1970年6月18日 雨 星期四

忽然听见叫“知青开会”。原来是西师附中的学习班同学，来了解和学习知青在农村是怎样生活的。生产队书记介绍我们队的知青情况，把另外几个比较优秀的大大夸奖一通（有不少水分），说得那些学生“啧啧”赞叹。然后叫三个知青发言，使他们很有面子（他们三个都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年龄都在20多岁了，我这时18岁多，在女知青里年龄最小）。

当然不会介绍我。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我的前途是极惨淡的，毫无参加工作的希望。最主要的是我有“黑疤子”（即“黑五类”出身），然后，既不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政治上也不突出先进。光是劳动出色，能够得到贫下中农发给的“毕业证”，却不能得到干部的。

### 1970年6月20日 雨 星期天

上午大沱口薅草。我没有去担粪，因为想到应该适当地注意自己的身体。

休息时我砍了两根竹子，准备给弟弟编个背篋，但是它们太孬了。下班时再准备去砍，但是今天砍竹子的人很多，都借张思梅的刀。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我心想等一会儿吧，先选好竹子再说。谁知道这些人都只顾自己，她们砍了竹子，听说疗养院有人来了（大沱口这片竹林属五指山疗养院所有，我们的行为属于盗窃，而凡是盗窃都特别来劲），她们拖着竹子就跑，连刀也带走了。我在上面等了很久，没听见响动，过来一看，她们已经跑到那边湾湾里去了。我追上去把刀要过来，仍然去砍了竹子，一共三根，拖到严光全那里去，请他给我编两

个背篋。

### 1970年6月21日 晴 星期日

记分员说昨天我们（妇女们）全都要扣半个钟头，原因是下班早了十多分钟，而且休息时多坐了一会儿。

晚上我去拉羊子时，有个妇女叫我去她家，说她家里有个包包，是妈妈给曾凡兰买的糖，曾凡兰不要，叫我去拿回来。我就去拿回来了。回来后妈妈说我真不懂事，她说曾凡兰把她家所有的糖票全部给我们了（是我们用粮票换的，每2斤粮票换1斤糖票，用6斤粮票共换了3斤糖票。她没有钱买糖。妈妈患有肾炎，不能吃盐，要多吃糖），而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奶娃。妈妈买糖回来后分了些出来，放在另一个妇女家，请转交曾凡兰，没想到曾凡兰不要，而我不知内情拿回来了。

于是晚饭后我把糖给曾凡兰送去。她两口子正在推磨，他们死活不肯接受，我转身就跑，曾凡兰就追，追出好远，她还是把包包还给我了。

### 1970年6月28日 晴 星期日

今天值得纪念，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摘苹果。本来不要我们去摘的，去年摘广柑我就没去成。今年呢，因为苹果太多了（大丰收），靠那些个别“可信任”的人一时半会儿摘不完，才把所有的凡是能摘苹果的人都叫了去。

我赶快跑去，苹果树很好爬，但是苹果很不好摘（它们都长在树梢上）。上午我吃了6个苹果，拿了两个带给弟弟吃。下午又吃了6、7个（可以想见当时的饥饿状况。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不让我们参加收摘水果的原因）。我们家分了18斤苹果。我还代替妈妈给金刚碑小学担了42斤苹果去。

### 1970年6月30日 晴 星期二

天气越来越热，不几天到小暑了。我身上长了许多痱子，又痛又痒。

早上六点上班，十点下班。中午二至五点学习，然后上班，到八点下班。一天的时间是很紧张的。

### 1970年7月2日 雨 星期四

大雨下了整整半天。我在家里剪了几张笋壳，剪个鞋样子。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做鞋子总是要走样（有一次做出的鞋两只全是左边的），技术太差。今天这双剪太大了，我决定做成棉鞋。

### 1970年7月3日 阴-晴 星期五

我背上30斤麦子，到河对面去打成面粉。去时，金刚碑的渡船在河对岸。我想今天还算凉快，到北碚去过河吧。没有想到刚涨过大水，河边不好走，要爬二道岩，多费好多力气。到了河对岸还要倒转来走一阵。打了面粉，回来时运气不好，船又在对面，等它划过来了，划船的张风箱又去吃饭去了。等他吃完饭，已经快打一点钟了。

### 1970年7月4日 晴 星期六

选五好社员，记分员刘远明提了我。去年选五好，也是他提的我（我多次当选为生产队、大队一级的五好社员，还当过一次公社的）。

**1970年7月10日 阴 星期五**

下午开会，我照旧穿着担粪的那一身衣服，在那群花枝招展的姑娘中，就好像一个叫花子似的，又破又旧，特别惹眼，很不好意思。我就在角落里坐着，后来干脆躲到一户人家里去。我在那里和尹邦明摆谈，后来讲起《七侠五义》来了。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有了6个人（加上我俩一共8个人）。我很想停下来，尹邦明提醒：“不讲了！”我马上不讲了。这件事做得很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讲这些。只能给尹邦明一个人讲。

**1970年7月27日 晴 星期二**

到红星生产队帮助知识青年雷建芬修房子。其实今天很好玩，红星队的李老七甚为诡辩，青年多，活儿轻巧。

**1970年7月28日 阴 星期二**

兔子死了三个。我和外婆在家打整兔，中午吃。我剥皮去内脏，外婆煮好、切好，凉拌。为此又煮了干饭（很难得吃一次干饭）。凉拌兔肉真好吃。

**1970年7月30日 阴雨-晴 星期四**

抽中午时间我到公社去了一趟，去找管知青的吴成学，想商量一下我们知识青年安家费的用处。每个知青都有83元安家费，用来修建房屋、猪圈，制农具等。别的公社早就发下去了，只有我们公社迟迟不动，而好多知青有切实困难的，也不解决。我自己的房间漏雨，檩子也断了，角子也粉了，急需修理。但是吴成学推三推四，问题没个结果。我只好回来了。

**1970年9月9日 阴 星期三**

尹邦明要走了。昨天晚上她告诉我时，我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她曾经说不去了。而现在呢，后天就要去重庆上船，到湖北沙市，去会见她的目前所谓的“靠山”——未婚夫。

**1970年9月25日 雨-阴 星期五**

尹邦明来信了，告诉我她一路平安，顺利到达了沙市潜江县。并说湖北的灯草绒很多，颜色有蓝色、咖啡色，要我寄布票去，她买了给我们寄来。但是重庆也有了灯草绒卖了，今天妈妈刚买了一丈枣红色的，打算给我的表妹缝一件，剩下的给我缝。

**1970年9月27日 雨 星期日**

近来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有可能读大学，是最高的理想，如果能走出农村，也很好。但最坏的一种可能，是留在农村。这是我最坏的打算，但又不得不往这方面打算。那么，我就要像曹大珍、曾凡兰她们一样，在贫困、劳累中生活一辈子。那是多么可怕的啊！

我有这个决心。既然千千万万农村劳动妇女都能生活得很好，活得很愉快，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呢？

**1970年9月28日 雨 星期二**

公布了工分。5至8月份，我在这四个月中做了900多分，加上上半年的，共是二千零几十分。我们全家共做了5570分。昨天下午关饷（按照这四个月的工分结算），我们关了24元5角。

外婆的问题（在社员们开会和政治学习时，“黑五类”必须强制劳动）也解决了，今天她到公社去开会，公社干部说，摘帽的可以参加学习，不必在节假日劳动了。

### **1970年12月6日 阴 星期日**

听说生产队有两个青年人要调走，年龄最大的男知青到电信局，不知是否可靠。而书记的弟弟（非下乡知青）是到化肥厂，已经开过了座谈会，就要检查身体，很快就要去了。

### **1971年1月9日**

男知青有一个参军了。到电信局的那个也去了。这样，两个男知青都走了。

应该轮到女知青了吧？我的年龄在女知青中是最小的，我前面还有四个女知青呢——加上又回来了的尹邦明。

我和尹邦明一起，决定趁男知青走了没有人搞墙报的机会大显身手，充积极，特别是尹邦明，花了三个晚上和一个下午，便出了一期墙报。

（说明：1971年旧历正月初五，我和尹邦明调到果树组上班，后来又和梁万华三个人编成科研组，几个月之后合并到果树组。尹邦明又离开了果树组）

### **1971年6月30日**

下午制作农药“五四零六”：

泥土，干重一百斤，喷水湿到刚能捏成团。加入二斤油饼，二斤再生母剂，一两石灰。搅匀后放置会计办公室进门左边墙角。摊成三寸左右厚薄，摊平，撒上草木灰。

另用泥土（干重）一百斤，加入三斤油饼，放置办公室进门对面墙角，制作方法和上面相同。加入的母剂、石灰也相同。

五天后取出。加入三斤油饼的呈灰褐色，稍有霉。二斤油饼的霉与前一种同样，颜色稍微深一点。两种“五四零六”制成后都撒到中稻田里。稻子有极少数开始抽穗。

### **1971年9月上旬**

嫁接苹果林靠疗养院的几行广柑苗。我初次嫁接，成活率大约在80%左右。

### **1971年12月13日**

到火炬公社（之前和之后它都叫澄江公社）去学习果树修剪。

青麻苹大树修剪步骤……（略）

### **1971年12月18日 阴 星期六**

又一个女知青调到北碚铁厂去了。又来了一个新的女知青，她叫金学英，家庭很困难。

**1971 年 12 月 20 日 阴 星期二**

开会时尹邦明告诉我，她如果有可能参加工作，那么就在 12 月份剩余的十天之内调出去，如果这十天之内走不成，那么就一辈子都在农村了。

**1971 年 12 月 25 日 雨-晴 星期六**

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是工作，生活应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以前一段时间，我专心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中的烦琐小事，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些事情，例如打听一些别人的私生活呀，研究一些人吵架、勾心斗角的事情呀，等等。这些事情最好少管，因为很使我精力分散。现在觉得这些事情腻味得很，倒不如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学到一点真正的知识。

**1971 年 12 月 27 日 晴 星期一**

今天决定杀猪了。

继父他们抬着猪先走，我担着箩筐后去。我刚把箩筐担拢，杀猪匠就杀猪了，先杀我们这只（好几头猪排着队）。我把血旺接好了，才发觉肉票没有拿。于是我担着箩筐回家，又把肉票拿来（无论送猪或杀猪，都只能得到一半的肉，另一半要送给国家。我们要用妈妈和弟弟的几斤城镇肉票，买回我们自己这头猪的肉）。

今年这只猪比较肥，一共有 9 斤多油、94 斤肉（不算头、蹄、下水）。我们得了 7 斤油、47 斤肉。

**1972 年元旦 晴 星期六**

元旦节，生产队不放假，要想上街的自己去，不愿意去的都上班。

上午我一共修剪了两棵树。第一组的男劳动力在担粪，我在树上，他们就从我的脚底下走过。我每次回忆起原来在一组上班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温暖，感到留恋。因此我很喜欢第一组的那些人。

下午，上街去的人一串一串的都回来了。调到电信局的那个男知青看见了我们，就停住脚步，聊了好一会儿天。他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热情，爽朗，他说他的工作并不很理想，空气不好（那当然，怎么能跟山坡上的空气相比！），不自由，寂寞。但是报酬比农村高，比如粮食就有保障，工资也够用。不过他还是很怀念农村，觉得农村生活很愉快。要是那时他没有调工作，也一定会到果树组来。果树组比农业组的技术性强得多，有个钻研头。他问我们看过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没有，那个电影好极了，他看了两次。他说搞果树工作的人如果看过这电影，一定会更加热爱果树工作。

我说我们本来就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这个人是很好的，以前我就和他很合得来。

**1972 年 1 月 4 日 阴 星期二**

开社员大会公布各户社员应收获的钱、粮（1971 年全年的，先要扣除在小春、大春和秋收时节已经分到手的）。我们家里一共有 108 斤粮，包括 38 斤包谷。有 249 元钱。今年的工分值是 7 角 8 分 6 厘。晚上就领粮、领钱。先领到 21 斤粮票、149 元钱。回家后妈妈拿了 20 元钱给我。

**1972 年 1 月 12 日 阴 星期三**

早上副队长叫我和他一起到歇马场去参加果树学习会。

遇到一个才从苍溪调出来的女知青，她被分配在供销社，专跑农村的经济作物队。她对这工作很不满意。她还告诉我，苍溪的知青已经调出来一半多了。

### 1972年1月22日 晴 星期六

生产队的出纳，一个女知青，要调走了，到北碚火车站服务大楼。她的出纳工作要找人接。书记叫大家想一想，然后再提出来。经过一阵静默之后，大家提了两个人，其中有我。然后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其中一个人。

我现在才明白我的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

### 1972年2月14日 阴 星期一

晚上到五指山疗养院看节目，见到我的小学同学杨益秀，她才从苍溪回来。她说她的那个公社，本来有70多个知青，现在还剩20多个，这20多个都是文教系统的孩子，有西师的、西农的、外语学院的，成分都是教员、教授、职员。看情况可能不容易参加工作。她和市二十二中学的几个教师子女才回家几天，是回来过春节的。

### 1972年2月

我爱书更爱音乐，  
我爱诗更爱美术。  
我热爱家乡富饶美丽的原野，  
也喜欢那蜿蜒起伏的山岭。

如今我又爱上了果园，  
那苍翠的枝叶和芳香的花朵。  
收获的季节果实累累，  
采果人的歌声是多么悦耳动听。

移植和嫁接需要格外的细致，  
修剪和治虫使你大费脑筋。  
除草、松土和施肥都算不了什么，  
因为采果这工作唤起你的热情——

平日静寂的树林现在一片喧闹，  
喜悦的话语饱含豪情。  
一张张笑脸挂满汗珠，  
丰硕的果子在微风中点头相迎……

果园是多么美好，  
工作是多么愉快而有意义。  
愿我的辛勤劳动使果园更加丰茂，  
愿我的热情使果园四季如春。



(上图：作者在生产队打农药时留影)



**1972年2月22日 阴 星期二 （20岁半，当知青第四年）**

晚上加班修堰塘，担泥巴。这已经是连续三夜加班了。休息时我主动去表演了两段节目（学唱现代京戏）。自己感觉是出乎意料的差，既呆板又拘束。虽是这样，却把大家的热情提高了，大家要求这个唱、那个唱，最后是我 and 睢代珍又合唱了一段。

我这一次表演是准备已久的，好几次我鼓起勇气准备演给大家看，事到临头却没有了胆量。就是今天，也脚酥手软，心里直打哆嗦，声音都变了。但是却给自己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一直希望能够经常为大家服务。

**1972年2月23日 阴 星期三**

晚上又加班，这是第四晚了，开始还不怎么感到疲倦，好多跟我很合得来的人今晚都来了，我非常兴奋。可是越到后来就越累了，连日的疲劳占了上风，渐渐的脚步就慢了。眼看要下班了，可是那边给砖窑挑砖的人，砖没有担完，干部叫大家都去担，于是我们又都去担砖。我担了八次，终于下班了。刚才打过了十二点钟。本来我还有好多话要记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就算了。

**1972年2月25日 阴 星期五**

连着加了五个晚上的班，白天做活儿就不振作了，眼睛老是想闭上。

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继父叫我报名考大学，使我吃了一惊。

这件事几天以前我就听说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印象，我有什么资格报考大学呢？

**1972年2月26日 雨 星期六**

刚才我从杨青素（大队妇女干部，也是大队书记的爱人）那儿回来。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和她谈得很是投机。

我从一个借口开始，问了她大学招生的消息。我问我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写申请？她说当然可以啦，虽然有成分论，但主要的是重在表现，我们公社已有一些人写了申请了。我问她怎么个写法，她说写出自己的学习目的啊，有些什么思想啊。她说现在公社名额还没下来，如果下来了，她告诉我，我就可以写了。在谈话中我问她，我的表现算好的、比较好的，或是坏的。她说算好的。

**1972年3月6日 晴 星期三**

这几天我连一点空闲也没有了，早上迟迟起不了床，上班时有点头昏脑胀的。中午下班回来忙着写入团申请书，又去挖菜园土（自留地），晚上是最紧的，有一天晚上去找了团小组长，然后连着加了两晚的班（担堰塘），还和刘□□表演了节目。再然后生产队果树组开会，再后来学习中央72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又连续讨论了两个晚上。今天晚上就是刚刚去讨论了中央文件回来。抽点时间写日记，平时晚上不许我开灯开得太久。

自从我在加班时主动表演了节目，叶光全（大队干部）看我比较大胆，有些工作就交给我做了。梁万华（果树组长）也叫我明天在全区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果树学习班”的报到处收钱粮。我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可不能马虎。

4号那天在大队听了传达报告后，大队黄书记又叫大家踊跃写申请读大学。条件是：25岁以下，初中毕业程度，但名额很少，公社才分配到一个。我不准

备写申请书，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今年先争取入团。

### 1972年3月8日 晴 星期三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不大快活。

昨天在我们生产队开三个公社联合举办的定期果树学习会，请了柑橘研究所的郭老师来讲课，上午是时事学习，下午才到苹果林去具体操作。

郭老师大约 50 多岁了，是北方人，他一生都从事果树工作。他先讲了柑橘的切接，紧跟着又讲了落叶果树的栽植，然后直截了当的批评我们果园里去年补栽的苹果苗修剪错了。这一根苹果幼苗是某某（本生产队果树专家）修剪的。郭老师不仅剪给我们看，还讲了为什么要这样。

昨天我负责收钱粮，到最后一算，钱倒是一分不差，粮票差 9 两。这使我吸取了教训。

我的时间更紧了，可能连记日记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我一定要抽空记。

### 1972年3月17日 晴 星期五

今天思想上受了不小的刺激，大队调走了几个知青（此前已经调走了好几个），我们队有两个：尹邦明到仪表厂，另一个到铁厂（但是到铁厂这个并不是下乡知青，而是生产队管副业如砖窑、运输等副队长的女儿）。这样我们队只剩下三个女知青了。

听到这个消息，金学英像被人打了一棒，话都不会说了。她的家庭极其贫困、渴望早日脱离农村（我曾经和她打赌，她肯定会走在我的前面，赌两碗红烧面）。

下午上班时我问了大队干部叶光全，他回答我：“你的那个问题（指调工作的问题），我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了，我们生产队的几个知青中，你的表现是最好的，现在就是要重在表现。”听了这话，对我鼓励不小。我坚信自己一定可以调出去的。

晚上，叶光全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一开口继父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叶说，这次调人，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也没有通过社员群众，光是王队长他们几个大队干部决定了就算。他建议最好由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说一下，提点意见。我巴不得继父到王队长那儿去。可是继父冷淡极了，矢口拒绝，说公社、大队早就决定了，去说也没用。

等叶光全走了以后，继父说：“你以为叶光全真的不知道吗？他比谁都清楚！只是为了当前的生产，怕我分心，来这么说一下，又安慰了你，又挣了他的面子。”

我这才明白继父刚才拒绝的原因。继父是生产队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

### 1972年3月18日 雨 星期六

上午开社员大会，继父到王队长家去耍，王队长告诉他，尹邦明到仪表厂的名额，是仪表厂直接点名要的，因为招工负责人是她的男朋友的同学，这是开后门走的。王队长安慰继父，说等另外两个女知青都走了以后，终归是要把我调出去的。他让继父放心。

于是继父教育我一番，说在现在的社会上，私人关系是要有的，比如一些关键的人，把关系搞好了，到关键时刻他们一句话就可以帮你的大忙。而像有些不足挂齿的人，根本就少去理他。

我必须好好的劳动两年，还必须是安心心的劳动两年，再由一个碰巧的机会调出去。多么漫长而又心焦的时间啊！（我还不知道，一直要等到 1978 年，才

凭考取大学走出农村。当我和妹妹同时考取大学时，生产队有些人还不服气，质疑：“为什么这一家可以走两个，而贫下中农家庭连一个也走不了？”）

在未走出农村之前，我要努力控制住自己。

### 1972年4月4日 晴 星期一

我在农村已经住厌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想法。以前，无论怎么累，怎么苦，我总是心情愉快的，高高兴兴的。可现在呢？劳动的时候总是很苦闷，一点也感觉不到劳动的乐趣。并且总是在胡思乱想。日日忧心忡忡，夜夜黄粱梦，这就是我现在的真实写照。每到静无一人的时候，我总是在给自己的未来编织很美好的图案。不过在表面我决不流露出一点这种心情来。

我很想跑到北碚去耍，我一点也不想上班了。

### 1972年4月7日 雨 星期五

看完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马卡连柯的著作都是很吸引人的。继父在整理屋子，拿出一大堆书报杂志，我从里面无意中翻到一本文化大革命初期各个派性组织印发的《毛主席诗词》，里面有好几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于是我找出本子把它们抄了下来。

### 1972年4月8日 晴 星期六

听说72年的招工任务比71年少得多，而且80%都是到渡口钢铁厂。我想自己就更不容易当工人了。早就听说市一师要招学生，而且招得很多，如果我能够去读书就好了。虽说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但是如果能把户口办出农村，就很好了。

我在想，进市一师读书比较有把握，因为教书这工作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我去，可能别人会没有意见。

### 1972年4月9日 晴 星期日

晚上开青年会，会场上气氛很活跃，民兵连长交给我一个任务，油印一百多份《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1972年4月10日 晴 星期一

晚上民兵训练，我和金学英先到王队长那儿去耍。王队长说市一师5月份招生，6月份正式开学，一共有900学生，在北碚区招450。条件是退职教师子女、下乡和还乡知青。

王队长还说，全公社只有26个知青还没有调工作，我们大队共有5个，相邻生产队那两个要后一步走。

我的心都飞到市一师去了。但我又考虑到教书这工作并不理想，矛盾重重。

### 1972年4月11日 阴 星期二

刚才金刚碑小学的黄老师通知我，明天到小学去代课，一个女老师做流产手术去了。

看来我是非教这倒霉的书不可了。等我代课半个月后，市一师就开始招生了。如果我能进市一师读书，那么这一辈子就稳定在黑板之前了。

其实我从不打算教书（我父母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但他们都落得很惨的下

场，只是当时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这样写)，教师这职业并不轻松，是非常辛苦的。

**1972 年 4 月 12 日 阴 星期三**

通知我晚上到大队开会，因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明天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她的工作要交接。今晚为了补充四个团支委，正式宣布十名新团员。

本来我们非团员不应该参加这个会，为了鼓励我们才叫我们去的。我听着公社团委书记发言，直想哭，我感到很大委屈，因为我生来就比别人矮一等。

**1972 年 4 月 14 日 晴 星期五**

今天外国朋友参观，游览北温泉。包车从我们这儿路过的时候，江老师班上一个女学生，名叫王修碧的（记忆中她是低年级学生，只有 7、8 岁），向车子扔石头（为了好玩，完全是无意识的），当场就被公安局同志抓住，审问学校、住址、家长姓名、老师姓名。下午金刚碑小学为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我母亲一听这事就非常紧张，以为是我班上的学生，如果牵连到她，全家都要倒大霉。之后很长时间，这个名叫王修碧的女孩受尽折磨，几乎吓疯，连累到家长和班主任也饱受折磨，江老师哭过很多次，幸好江老师出身贫农）。

**1972 年 4 月 17 日 晴 星期一**

这几天我在争取进市一师读书。我看王队长的态度是支持我的。我写好申请书，交给王队长了。

代课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学生们很乖。

**1972 年 4 月 21 日 雨 星期五**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金学英调到重庆子弹厂。下午又听说，金学英是到 190 部队。我真为她高兴。

我到底能不能进市一师，都还成问题。

**1972 年 4 月 22 日 雨 星期六**

下午金学英到我们这里来玩了一会儿，她说到哪一个单位还没决定，先填了表，是公社发的推荐表，听说是北碚手工业管理局。

这几天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又变了，越来越坏了。《牛虻》中的列瓦雷士对琼玛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我是一头自命不凡的小野兽，以为这个世界是用棉花和蜜糖包起来的，温暖而又甜蜜……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既严酷又无情……”

我回忆起了这么一段话，用这一段话来和我的生活作了一个比较，发现我必须向牛虻学习。必须顽强地生活一辈子。

**1972 年 4 月 26 日 晴 星期三**

今天是代课的最后一天，上午上了三节课，中午跟叶老师办了移交，下午回生产队上班。叶老师的爱人在市一师教书，他说，市一师不在农村招生，而是招工矿的工人，和退職教师的子女。召知青的任务是市二师，市二师在重庆南岸。我大失所望，心想到市一师是去不成了。但是下午又听说，市一师招生的任务已经下来了，我们公社是 20 个名额。

团小组长的女朋友传话，叫我晚上到大队去开青年团员会（即有“进步青年”

参加的团组织会议)，据说是通过新团员。但我没有去，因为团小组并没有正式通知我，冒冒失失闯了去多丢脸。

我到王队长家去了，王队长家正在吃饭，去玩的、去办事的人多极了。吃过饭他们打扑克，我就看他们打。我想今晚上这么热闹，要想谈什么是不可能的。又来了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过一会儿我就告辞走了。如果要等到王队长得空，不知要多晚。

我是想去问一下关于市一师招生的事。

#### **1972年4月27日 雨 星期四**

晚上我和金学英到王队长家里去玩了一会儿。很巧，今晚上没有其他的人。王队长和我们谈得很融洽，他很支持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愿望都很了解，很同情。他说反正是能够调出去的，即使这一次走不了，下一次也是要走的。

#### **1972年4月28日 阴 星期五**

金刚碑小学的老师今天到天生桥小学开会，妈妈也去。她说，市一师附小的老师告诉她，市一师不忙招生了，因为最近下来了一个指示，说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城市人口陡增，必须控制起来。去年因为市一师招的农村人口太多，今年就不招多少农村的了。具体怎么办，还没决定下来。我只好慢慢等着。

我目前没作长期打算，只是活一天算一天。

晚上到大队开民兵会，团支部副书记汤传江和杨远明找我谈话，主要就是说我的入团问题。因为我的申请书不知被搞到哪里去了，开支部委员会时没有看到我的申请书，就没讨论我的问题。但是他们考虑到我的表现还是比较好，他们就向公社团委提出这个问题，朋吉模（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是民兵负责人）对我的印象也比较好，叫杨远明多作工作。因此他们向群众收集了意见，今晚找我谈话。杨远明说，他们在最近几天追查一下我的申请书，抓紧时间讨论一下。如果在五四那天可以赶上宣誓的话，当然很好，如果赶不上，就等到五月下旬的那一批。还说五四那天公社到缙云寺搞活动，叫我也去参加，并想法子搞几个节目。

#### **1972年4月29日 晴 星期六**

知道组织上注视着自己，关心着自己，心里多么温暖呵。我感到前途光明灿烂，美好的生活就在面前。昨天晚上杨远明说，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接受我入团，但是思想上却是入了团的，他们也把我当成团员一样对待，这几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只是上班时不大痛快。罗世模说：“好像这几天你有点闷闷不乐？”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也不是愉快，也不是焦急，反正不大想说话，工作上也松劲了。这几天我一心挂几处：市一师什么时候招生啦，团支部什么时候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啦，还有别的，等等。

#### **1972年5月2日 晴 星期二**

金学英比我更着急，因为她虽然填了表，却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她比我沉得住气，她不像我这样容易激动，我真佩服她。

#### **1972年5月6日 阴雨 星期五**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公社组织青年活动，到缙云山搞拉练。早上下了点雨，10点钟我们赶到人民大队的曾家坝，这里正好是缙云寺脚下。但我们到这里来真是跑冤枉路。

从曾家坝出发走了半小时，才开始登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滑，朋吉模催着大家快走，还要防空，还要跑步行军，爬到满山红小学（之前和之后它都叫白云寺小学）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在小学休息了一会，就向缙云寺出发，也是跑。金学英已快跑不动了。到缙云寺休息、吃饭，我们吃自己带的馒头。到下午两点多钟，又向北泉出发，这次不走小路，走公路，排成四个纵队，37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很可观，边走边唱歌。快到黛湖了，朋吉模又叫大家跑，这一阵跑呀，一直跑到绍龙寺才停住。很多人都掉队了，金学英也掉队了。

到北泉后作总结，分大队照相留念。

### 1972年5月7日 晴 星期日

金学英走不成了，因为来招工的只要他们本单位的3个人，而金学英他们3个是搭出去的。既然招工的不愿意多招三个，公社也就不同意，干脆6个都不走，都等下一批。

我如果在农村呆一辈子，那将会苦闷死。生来又是个女的，可是偏偏跟男的合得来。不论老头、中年人、小伙子，都合得来。只有那些妇女我最看不惯。如果长期在农村住下去，我怎么能离开这些叽叽呱呱的妇女们呢？

自从在金刚碑小学代课结束后，我发现教书这工作很神圣。这是从工作意义上来说。你想想吧，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教师的帮助下，慢慢会认字、读书、写字、画画，如果教师真正地关怀他们，爱护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光是从你这儿学会科学知识，同时也接受你的思想，学习你的社会经验。等他们长大以后，你最关心的那一部分学生将永远记住你，并且给你必要的帮助。妈妈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就是这样。

从工作待遇来说，只是粮食定量不够高。一般教师四五十元钱也足够了，而且老是衣冠楚楚的，不受日晒雨淋。总的说来，比当农民强多了。

### 1972年5月9日 晴 星期二

妈妈叫我到北碚去买米，在河边碰见一个在重庆轮船公司工作的以前的邻居。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轮船上的事情。他还告诉我，重庆全市召开了一个“经济座谈会”，在这个会的纪要中说，1972年招知青的名额，全市不超过300人。如果像我这样的情况，要想进工厂，只能等到1973年的8月份。

我又坠入了五里雾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得不将日后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市一师招不招生，说不了一定，而我除了这个机会，另外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不能到师范读书，果真要等到1973年8月的话，我得经受一个长期的、严酷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我得忍受一切。……《牛虻》是我的好榜样，列瓦雷士的困难比我大一万倍，他四面受敌，还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克制对亲生父亲的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他都经受了一切，我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 1972年5月11日 阴 星期四

这一个月时间真是出奇的慢，慢得数一天过一天。好不容易挨到11号了。如果照这样过日子的话，等到73年我头发都会变白的。

昨天，我把在河边听到轮船公司的人说的话告诉金学英，她说就好像被人打了一棒似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体会到，因为我听了不也像被人敲了一棒吗？

我必须作好长期打算。万一不能去读书，那么就还得在农村呆上一年多。这一年多将是怎样的苦闷呀……这种长期打算具体该怎么去作，我脑子里现在一塌糊涂。万一又闯下什么祸来，那怎么办呢？

### 1972年5月20日 晴 星期三

下午我去记工分的时候，谭队长（在生产队分管副业）找我谈话。

他说，昨天晚上生产队党小组开会，讨论了我的入团问题。因为大队团支部把我没办法，就请示公社团委，团委更没办法，就交到生产队讨论。我算是一个特殊人材。

党员们提意见说：我的表现一般说来比较好，但是有三个缺点，一是对家庭划清界限不够，因为批斗外婆和妈妈时，我没有站出来揭发检举。二是起带头作用不够，上班时别人偷懒我也一起偷懒。三是听不得批评，小气。

有了这三条就够了，我一辈子也别想入什么团了。我气得不得了。家庭没出什么问题，家里的人又没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凭什么我要揭发呢？又能捏造一些什么事实来揭发呢？上班没起带头作用？其实我往往是很积极的，什么事都主动去干。从现在起，听了这些所谓“意见”，我是再也不会主动去干了。

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农村里不合理的事太多了。难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吗？别的团员可以凭几个支委说了算，而我呢，就这么一级一级的老是讨论，讨论没个完！

入了团入了党的，并不一定都是好人。而没有入团入党的也不都是坏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后来才知道，其实党小组讨论时是通过了我入团的，只是这个谭队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跟我谈话时不提“已经通过了”，光是说很多缺点错误，把我气得一辈子忘不掉。也许因为他跟我的管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继父，在工作中有些矛盾？我继父是决不入党的人。不过又一想，也许他说了“已经通过”，但是语气很轻，以至我没有听明白？）

### 1972年5月21日 阴 星期四

我今天思想上不再激动了，我发现自己早先打错了算盘。何必要写什么入团申请书呢？何必要去充什么积极呢？自讨苦吃。

没能入团，这个打击我勇敢的承受住了。谁知道还能有什么不能预料的事发生呢？

我必须把性格改变一下，以前是好胜的，活泼的，现在应该安静一点，应该与世无争。这样我才能好好生活一辈子。

### 1972年5月22日 雨 星期一

前天王队长告诉我，公社已接到上级指示，除知青外一律不得调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真高兴啊。还说市一师改为8月份招生。据说光要知青，其余一概不收。

### 1972年5月23日 晴 星期二

晚上五指山疗养院表演节目，妹妹去看了，回来后她说：“今晚的节目太好

看了！”原来，那是疗养院本院组织的表演，其中一个《洗衣舞》（一名解放军战士和许多藏族姑娘争抢着洗军装的歌舞节目）。表演解放军的那个小伙子，跳得真孬，下面的人“嘻嘻”直笑。他忽然回过头向观众骂道：“笑啥子？日你的妈，老子硬是要演这个！”然后一脚把洗衣盆踢出老远，“砰”的一声，他转身就进去了。

#### 1972年5月28日 晴 星期四

上午在大岚垭栽秧子，一个在区委工作的人回家来耍假，他说，市一师、市二师、市三师都到南充、苍溪去招生，已经去了，本区完全不招。

听到这么一个坏消息，我也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感到绝望。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够离开红光生产队。但是日期茫茫，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得成，而又不知道是去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工作。

#### 1972年6月24日 阴 星期天

6月21日团支部开团员大会，通过了我入团，会上37个团员一致赞成我。杨远明拿一张志愿书给我填了，这就只等着团委批准了。

#### 1972年6月30日 晴 星期五

这几天我在研究一本书，《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书中介绍了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最尊敬的作家，他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过我不少的教育和帮助，每次看完这本书，心里的感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它使我考虑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我已经21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像我这样大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饱经锻炼、久经风霜的人，而且21岁那年他就已经开始瘫痪了。我怎……（没有写完）

#### 1972年7月4日 晴 星期二

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在一生中永远不留渣滓，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才算有意义。

我离这个要求远得很哪，也许永远达不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是我的榜样。

#### 1972年7月14日 晴 星期五

昨天评工分，不知道在干部会上是怎么讨论的，果树组长梁万华思想抛锚了，本来该打药，可是梁万华不来，就像失掉了主心骨，我们几个一盘散沙。

李明华闷着脑袋，只顾剪他的砧（砧是嫁接果树时的母干）。两个女孩守着一部坏了的喷雾器呆坐着。我把喷雾器绑好了，见没有谁带桶来（大家都不愿意带桶，因为打药容易把桶搞坏），我就去找梁万华借桶。走到转弯处去一看，梁万华正在二组担粪，他的桶我也借不成了。怎么办呢？

我去找李明华，商量找桶的办法。他说：“你管他呢！大家都闷住脑袋不吭气，你东一趟、西一趟跑什么呢？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要磨洋工大家都磨！”我问他的桶哪儿去了，他说好久没担，恐怕裂了口了。我一想也是，大家都不管，我何必要操这份心呢？

这时前几天的想法忽然涌上心头（即“人到底怎样才算生活得有意义”）。“年



轻人嘛，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是刚才一位大婶对我们说的话。我几天前想些什么？要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工作一辈子，要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榜样！一股豪迈气概升了上来：梁万华不来了，我要顶着干！

于是我跑到沟下面去借了一挑大桶，上午我们耽搁了的时间不算，也打了十多棵苹果树的药。

2011-9-28 录入完毕

2011-10-6 校改

---

【文摘】

## 遭受大会批斗实录

吴 宓

按：著名学者吴宓的日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上批斗会的各种人物数不胜数，但极少有人在被批斗后及时记录下批斗会的实况和实感，因为当时如果所写记录被发现，定会被视为在记“变天账”，会遭到更严厉的批斗惩处。而吴宓却我行我素，仍然把日记当作他唯一的谈心对象和为后人记录的信史，坚持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写下了他的亲历及感受，成为研究文革不可多得的民间史料。这里摘录的吴宓日记中记录的几次批斗会实况，1968年的两次全校大会，由造反派红卫兵召开，1968年底和1969年的两次中文系批斗会，由工宣队召开。几则日记均摘自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本刊对文中提到的一些人物依据该书中的注释略加了简注。原文中有的字加有下划线或着重号等，本刊从略。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1968年）六月十八日 星期二

（注：这里记录的是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召开的对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永青的批斗会。吴宓被抓去陪斗。“春雷造反兵团”是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的红卫兵组织，得到当地驻军支持。其对立派“反到底”派的“八三一战斗纵队”在与“春雷”的武斗中败退后流落在外，此时“春雷”成为学院的主政者。）

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

先是3时甫过，曾文辉（注：中文系办公室秘书，负责监督管理吴宓等“牛鬼蛇神”）陪导一学生来，该生盛怒汹汹，持有系绳之纸牌，上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挂于宓之胸前，又夺宓手杖掷地上，不许拄杖，逼宓速行。其后彼另取一途去；由曾文辉独导宓至十二教楼前之方场，见张永青、漆宗棠（注：政教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盛叙功（注：地理系教授）排成一行，曾命宓入队。宓即立盛之左（曾退去）。

已而另有学生数人手执竹条（破竹为之）来，驱宓等至新礼堂左（即汽车房前）之方场小立；此时，一群小儿手持树枝（带叶者）从后追打宓等之头顶及肩背，颇痛。

到此方场后，盛叙功与宓另并入一队，约六七人（皆教师），小儿等续打不

休，且投击小石子，直打宓等之顶额及面、胸部；盛叙功左鬓角中一石，伤口为十字形，宽长皆盈寸，血大流，一巾全湿血，复以纸掩之，纸旋被夺。（宓大呼曰：“血出矣！”观众反以为笑。）此时，一学生谓宓无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遂代为拔下，置衣袋中携回。……

一老妇，黑衣，面凶横，责数张永青曰：“都是你们这些人，把我们穷人害得苦不堪言！”（宓窃思：办学、长校者，于此何罪乎？）……

已而开会矣。一群健壮之学生将宓架起，两人挟一人，余人从后急推，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宓几次行不及速，几倒地上。幸路近，入礼堂大门，台下（依台）排置长条连桌之椅，拥宓等登椅而立，面对全体礼堂满座之群众，一一但不许以手扶面前之桌。须弯腰低首而立，久则甚倦（幸未禁止双手支膝上）。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责令宓等不得微起头，或蹙眉，或切齿。

排定后，以张永青跪正中；张之右为盛叙功，再右即为宓；宓右为李一丁（注：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汗滴地成涔；再右为一女员，而终。……

广播“开会”后，历数张永青之各款罪行。第一款“尊礼、宠用、包庇”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第一件即宓。于是详播宓之罪行“一贯反共”，举“易主田垄血染红”“共产党是我的继母”“三两粮、二两粮”等例，而不及学术思想。然而引宓案归罪张永青。此案既定，于是全体高呼“打倒张永青！打倒吴宓！打倒一切阶级敌人！”

然后转至第一款之第二件。……如是共历五六款，凡三四十件（许多人及事，只简单一语带过。生人如戴璠璠（注：生物系教授）、赵维藩（注：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死者如锺稚珩（注：中文系教授）、卫怀杰（注：图画科讲师，1965年社教运动中自杀），皆不遗漏，点其名）。

总之，其主旨，在指明此等人原为国民党之少将、县长、区书记、党员等；而张永青之罪，则在为国民党图复辟，重掌政权云云。

最后，完毕，散会。并宣示“将再斗争张永青，众各分别劳动（按规定）”云云。

散会时，命宓等先退出；仍被挟拥、推排，急行出，不断遭竹条及树枝打击。——幸宓走过卫生科后，即完全得释，无人押解，自徐归舍。

以所历简告唐昌敏（注：吴宓雇请做家务的女工）。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

（摘自第八册480—482页）

（1968年）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夏至节，阴，大雨。

……

上午7时，闻广播今日上午8：30全校再斗争张永青、李一丁大会。命宓等陪同受斗争。宓即整备：除上身着毛衣（厚裹）外，不戴眼镜，不携手杖，衣袋中全空，不留一物。仅以大雨，戴草帽，胸前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大纸牌。

8：10即出，至大礼堂。守门人命宓在大礼堂外左廊下仁候（今日大雨，小儿无来者）。久之“牛鬼蛇神”不见一人来，宓乃走入大礼堂（俗名新饭厅），守门人指令宓进一小方室（在台下右后，梯口，通道），俯首立于张永青之左（稍

隔)。“牛鬼蛇神”陆续至;然今日陪斗者较少,共约六七人,盛叙功在,余人多不识(看不清)……

8:30 广播开会。宓随张永青走入会堂。红卫兵一群,从后猛挟、拉、掀、推,且以拳及鞭打击。宓一再倒地爬起。彼等夺宓手中草帽掷远处;其他人之草帽一二,亦皆践踏破毁。

彼等先使张永青及宓等立台前之平地上(面对群众);瞬即改令仍立一长排凳上,同昨(不容自行上凳,而不断推排打击)。

凳上张永青、李一丁跪正中,陪斗之“牛鬼蛇神”分列左右:宓在右之末端,最近堂之大门。宓等皆曲躬、弯腰、低头如昨。对面坐第一排之女生们,今日未以竹条击刺颊面,仅用手按头使更低,又偶喝令“毋得双手按膝”(实亦未禁此)而已。

今日之总题目,为全校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斗争“国民党代理人”兼“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代理人”张永青(西师党委书记兼院长)李一丁(西师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长)及其同伙,多年来“收揽、任用、包庇、纵容彼阶级敌人国民党余孽、特务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之罪行”。

盖今日之会,为六月十八大会之继续(其后半)。故前会以批判张永青为主,今会则以批判李一丁为主。

前会所揭发、指斥之罪犯(“阶级敌人”)皆教师(而以宓等两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首),十之九非党员,今会所揭发、指斥之罪犯(“阶级敌人”)则为校内党政干部及职员。

前会中进行控诉、揭发者,有助教,而多为学生(按,今之四年级外,二三年级,则是1965与1966入学,而未尝上课者);今会中进行控诉、揭发者,多为久任小职、屈抑在下之党政干部及职员。从可知矣。最后,又提出“压抑、排斥工农学生”一项罪行。总之不离“阶级斗争”题目。……

会中,唱歌,欢呼,费时不少。控诉、揭发,言词冗漫。

指斥之罪人,举例,如(一)刘同纪(注:学院组织部副部长)、杨鉴秋等,(二)苏鸿昌(注:中文系教员,前党总支书记)、季平(注: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等,(三)叶诚一、孙述万(注:图博系教授,图书馆馆长)等,(四)袁有明、李源富等。最后,又零星增提多人(不成类系),内有普施泽(注: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景白(注:中文系教员)、陈平章(注:史地系教授)、汪正琯、邓益寿等(教师居多)。……

大雨不止。最后广播散会。命“张永青、李一丁滚出去”;次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宓、盛叙功滚出去”。宓即随张永青走出,而红卫兵多人,立即挟、拉、推、排宓踉跄出会堂,下阶,跌倒在马路上之雨水潦中。宓起立,婉言请求“入会堂,取草帽”,红卫兵大怒,骤以皮鞭猛击宓背多次,皆中右背与右肩,幸内服两层毛线衣,尚不觉如咋左胛之痛。宓急逃,彼追及,最后在宓右股之外侧,用力着一鞭,乃退止。宓痛极,凄然急行(张、李在宓前,木然各不相语)。冒大雨,绕十二教楼侧而回舍。惊魂甫定,视表则正11:30a.m.耳!(在会中,觉时久,以为已下午二时矣。)

(摘自第八册 486—488 页)

(1968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注:此时西南师范学院群众组织已经撤销,学校由工宣队及革命委员会主政。)

（下午）宓（继张清津）被召出，3—5 中文系师生在 3129 教室举行仪式“斗争罪大恶极之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大会”；工宣队领导人汤（戊）陪护宓往。

先在教室门外久立，已而开会；二三人挟推宓入会场，宓翻滚在地。并受拳击。命宓低头、鞠躬，面对群众而立（久之，两腿痛甚难忍）。会众连呼口号“打倒吴宓”。登坛揭发宓之罪行者六人，最后一人女（疑是曾宛凤）；大意谓宓出身地主官僚家庭，怀有极深之阶级仇恨。既怀念蒋介石望其复辟、重来，又赞同刘少奇以至张永青之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甚至赞许二月逆流中人，而反对毛主席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在西师备受优待、尊崇，乃犹不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公开攻击党与毛主席，尤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毛主席诋毁备至，实难令人容忍。

以上皆引据宓历年日记及《吴宓诗集》中例以实之；其所举 1967—1968 宓日记中之语句，对宓更为致命之伤。谓宓“罪该万死”诚是；惜生固艰危，仍不易即死耳！……

散会，宓退出，仍被数人挟拥，翻滚地上，并施拳击。

（摘自第八册 661—662 页）

### （1969）五月九日 星期五

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半阴晴。（注：此时吴宓已随师生迁到西南师范学院设于川东梁平县的分校。）

午饭后，获通知：中文系革命师生，定于今日下午 3——6 时，举行第二次斗争宓大会（地点，在食堂）。

3 时来二男生，带宓至食堂外，命宓俯首鞠躬（注：此处吴宓在日记上画了一俯首鞠躬小人）在此立侯。中文系革命师生，在食堂内主席台（戏台）前，宣布开会。有顷，大呼“将宓提入”（宓不惧“斗争”，而最惧斗争前之被抓拥入会场）。于是凶猛之二男生来，分挽宓之左臂、右臂，快步疾驰，拖宓入食堂（由两行横木厚板之间走进）。行约及 2/3 处，宓大呼曰：“请缓行。宓脚步赶不上，将跌倒！”彼二人大怒，遂趁向前奔冲之势，放手，将宓一猛推，于是宓全身直向前左方，倾倒在极平之砖地上（注：吴宓在此处画一倒立小人）。宓全身骨痛已甚，而彼二人怒益增，径由后挽起宓之左腿，拖动全身，直至主席台前，面对群众（注：吴宓在此处画了两排共八个站立小人），接受斗争。

此时宓（注：吴宓在此处画了一半坐小人）半跪、半坐地上，以手掩胯关节最痛处，竭力撑持。斗争凡历三小时（3—6p. m.）中文系教师徐永年、粟多贵、张秀华等，学生某、某（男、女，皆不识）等，共约二十余人，各读出其撰就之稿，对宓揭发、批判、斥责；内容则自“宓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经过“三两粮、二两粮”，“称党为继母”，而至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尤其反对文化大革命，仍多摘录“吴宓反动日记”，终乃判定宓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兼现行反革命分子”云云。（宓此时但感觉身体之痛苦；对发言内容、罪名轻重，皆不遑注意及之）。……

6p. m. 散会（晚餐）。此时，有身体雄伟、性意和善之中文系男生二人（宓皆不识）径来将宓从左右架起，分负于肩上，快步急行（宓两足离地约一尺，完全脱空；宓两手挽二人之颈），走出食堂，由内院至外院，直入“牛鬼蛇神”室，放置宓身于宓之床侧。彼二人不言径去，宓心极感激（盖其时宓已成半死，非其助何能得归）。（注：吴宓经此次批斗致腿骨跌断成终身残疾。）

（摘自第九册 193—104 页）

## 【文摘】

### 改造日记（节选）

叶浅予

按：本篇摘自叶浅予著《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叶浅予是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文革爆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同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理事，在“革命大批判”中他被扣上三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因抗战中曾在中美合作所绘制抗日宣传漫画），历史反革命。群众批斗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作者诗中有“三年牛棚七年牢”之句）。他在自传中引用了他1966至1967年间所写的两本《改造日记》（1981年由专案组发还）中的一些文字，不过他坦率地说明：日记中写的，“和当时内心独白距离很大”，“它可以蒙骗管教人员，借以过关。……日记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过关性质。”“翻看了‘文革’中的日记，使我记起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可也看清了我在狂涛之中如何保全自己的曲线求生之道。”（327页）为让读者了解日记中未能写出的一些真相，本刊将作者在引用时所作的说明一并摘出附上。

#### 1966年8月23日

今天早晨我面临的这场风暴，对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育，我的罪行激怒了群众，挨了打。但群众仍然是有分寸的，不然，即使把我打死，也解不了恨。这一打，更深一层认识我的罪行的严重性，使我的头脑更清醒些，对待运动的态度摆得更正确些。我坚决相信党、相信群众，准备迎接任何考验，相信党和群众会给予我自新的机会。

##### 自传中的说明——

这天挨了打，挨得不轻，背上衬衣血渍斑斑，后脑勺打了个洞。日记上却不敢如实描写，为什么？怕暴露不满情绪，引来更重的惩罚；日记后段又写得如此超脱，如此光明磊落，标榜自己站在革命立场看待这场惩罚。……那次挨打的一共三个人，一个罗工柳，一个黄永玉，一个是我，都是在黑画展览会场挨的打。

（以上见该书327页）

#### 1966年8月24日（注：原书中印作“1968年”，显系错植。）

砸不砸外国石膏教具的问题，在大字报上讨论了几天，今天由于北京师范大学革命派同学来我院造反，迅速促成了这件事。决定砸！凡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不论中外古今都砸！牛鬼蛇神赖以欺骗青年毒害青年的工具和教条将一起宣告埋葬。

大会在操场上开，雕塑系一位同学控诉：“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依仗这些东西毒害了多少青年！今天要砸烂这些东西，让牛鬼蛇神永远不得翻身，永远害不了我们！”

接着是一位工人同志的控诉：我们当模特儿，每天连续三四个小时，动也不能动；有时候要我们穿着厚衣服在太阳底下晒，他们这些老爷们却躲在大洋伞底下画。文化大革命，我们才得翻身。我们要斗臭他们，斗倒他们！

听了这些愤怒的控诉，头脑里立刻出现了上课的情景：我们对待模特儿像对

待石膏一样，不当人待。这和工厂主对工人们压迫剥削完全一样。我们把这套教给学生，让学生跟我们一样对待模特儿。这就是阶级压迫！又是和平演变！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居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我们有两件法宝：一件是业务上的“专家权威”地位，欺骗无产阶级文化低，得向我们请教；又一件是组织上有靠山，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利用我们作为和平演变的工具，我们今天跪在石膏面前，是叫我们向人民低头认罪，叫我们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丑恶灵魂，应该和石膏教具一样，一起被砸得稀巴烂！

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这短暂的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

（以上见该书 326—327 页）

**1966 年 8 月下旬某日**（注：书中引用时未注明具体日期）

关于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记得还有一次是李苦禅，一次是艾中信，都是因为汗出得多，自己擦不着，叫他们帮我擦，当时曾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自己的回答是：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挨了打，背上还贴了好几块纱布，几天没擦汗，请人帮忙擦一擦，一次这样做了，二次、三次也就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经人一检举，才认识到影响极坏，的确像故意拿伤疤给人看。别人对我的怀疑是出于革命的警惕性，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牛鬼蛇神，应该如此，我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

**自传中的说明——**

有天晚上，牛棚开生活会，那个专打小报告的“红色牛鬼”，检举叶浅予挨打之后，第二天还穿着那件血衣，不是有意叫人看吗？另一个牛鬼检举我在宿舍里叫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我解释说天热出汗，背上红药水从纱布里渗出来，自己擦不着，只好请人帮忙。这时牛棚里议论开了，说，明明亮伤疤给人看，还解释什么！生活会的作用是“狗咬狗”，抓住效果追动机，追得你承认动机不良，才能算完。

（以上见该书 329 页）

**1966 年某月某日**（注：原书中未注明具体日期，估计应为 1966 年 9 月某日）

我们四人开了半小时会，首先谈谈对劳动的态度，彼此展开了一点批评，李苦禅批评我打扫厕所时把主要的活都占了，一味照顾他，他认为是缺点。经他一提，我立刻认识到，这是我参加劳动以来很不对头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各人的劳动应该互相严格监督，不能有一点点温情，我对李苦禅的照顾，不是真正帮助他，而是在他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

**自传中的说明——**

牛鬼们分组分工包干全院的环境卫生工作。国画系四个老头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蕖为一组，四人中我的体力较强，其余三人较弱，干活我总是抢在前头。劳动中间谈体会，三人有怨言，怪我干得太多，抢了他们的劳动份额。

（以上见该书 330—331 页）

**1966 年 10 月 4 日**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

很狡猾。

2、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像狼。

3、专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我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争的滋味到底不好受。像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好。最近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想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为自己贴金，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 1967年5月9日

今天读主席《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敌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注：《冰糕颂》是作者写的一首打油诗，《大同组画》是作者画的一组漫画，被批判为攻击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做结论。

【简讯】

## 2011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边 犊

一、1 至 4 月,《邱会作回忆录》在香港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李作鹏回忆录》由北星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极大关注。

二、4 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编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文革时期的上海市民生活作了多方面的梳理、分析,为文革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

三、5 月,以文革美术印刷品及其他各类出版物的整理、收集为主要工作的“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于 5 月 22 日在京成立。开业当天的展览主题是:1915-1975,新妇女和新少年。展出从“美人图”到“铁姑娘”的一系列画作。

四、7 至 9 月,在“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之际,海外学者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于 7 月在香港出版。8 月,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与《记忆》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9 月,“九一三”事件当事人的亲属、外交官、记者等在京召开文史研讨会。9 月 13 日,林彪之婿及黄吴李邱之子前往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遇难处祭奠亡灵。

五、10 月 6 日,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元老子弟和党史学者二百多人在京召开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会议由胡德平、叶选基主持。与会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再来一次文革”的观点,强调要彻底否定文革。

六、10 月 15 日、22 日,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举办了两次座谈会。郑仲兵、李洪林、卢弘、陶世龙、张思之、阎长贵、何方等学者发言。其中,阎长贵就《决议》对文革的“定义”,提出批评。这个发言以《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为题发表于《记忆》2011 第 13 期(总 78 期)。

七、12 月 10 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在京召开“第二届文革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湖北、韩国、法国的 26 名中外学者与会。提交的论文,不但包括群众组织、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运动等政治性内容,还包括性观念、婚恋、血缘、女性服饰等文化性内容。

八、12 月 26 日,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病逝,终年 57 岁。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为学界所推崇。生前曾对文革历史做了许多研究,前些年受邀撰写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型丛书中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在已经写成两万多字时被发现癌症,因病痛折磨而被迫中断写作计划。他的逝世是文革研究的一大损失。

九、12 月 26 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了《联合行动》45 周年纪念会。与会者近二百人,多为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有与会者称,发言中没什么政治内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文革题材书籍的出版方面继续走在前头，除前述几种书籍外，2011年还陆续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了原“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以“许爱晶”之名所著的《清华蒯大富》（3月）；由中国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之二（3月）；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原四川造反派红卫兵领袖（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4月）；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原外交部造反联络站领导成员杨荣甲著《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7月）；此外，还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文革中曾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人民勤务员总部”和市级机关红司的一号负责人魏绳武著《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5月），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王海峰对他参加造反、参军、退伍后被打成“北决扬分子”等曲折经历的回忆录《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11月），肖健卿、李近川主编的《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12月），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12月），聂树人著《地质东方红兴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12月）；在12月5日林彪104岁诞辰之际，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了《林彪文集》，全书从收集到的林彪的文章、报告、信件、电报等超过120万字资料中精选了89篇、58万字。